

第一章 王震挥师进青海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我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西的扶风、眉县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展开强大攻势作战，一举歼敌4.4万余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为了彻底解放大西北，扶眉战役之后，我1野兵分3路，向大西北疾进。左路军1兵团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取道陇西、临洮、临夏，直向西宁挺进，歼灭沿途与西宁一带之敌，解放青海。

西进正值盛夏之际，路过的又是干旱地区，部队相当疲劳。

王震作为一员战将，为大家所熟知。其实，作为1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又十分注重从政治的高度把握问题，十分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行军途中，他专门把兵团政治部主任孙敬远找去，布置政治工作任务。

兵团政治部主任孙敬远根据王震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各军宣传部长座谈会。会议还没开始，孙主任先对大家说：“这次会议研究部队大进军中的思想问题，是王震司令员亲自交待我安排的，……”话还没有说完，王震司令员已走进门来，一一和大家握手，并亲切地问候，请大家就座。孙主任请王司令员先说几句。王司令员说：“好啊！那就先说几

句，这次长途进军，部队很辛苦。现在全国形势都很好，大家要努力。部队的思想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不能报喜不报忧，越是情况好，越要看到缺点与不足，越是把缺点与不足克服掉，部队的情况就越好。所以，同志们汇报情况时要实事求是，研究怎样把思想工作做好。”

大家都知道王司令员的脾气，最不喜欢只讲好听的，不讲或少讲存在的问题。所以，在汇报时，大都一分为二，重点讲到部队思想的主流是好的，不畏长途行军的艰苦，愿为解放大西北贡献自己的一切，同时，也讲到少数或个别同志的现实思想。

当 1 军宣传部长刘瑞芳汇报到战士们不顾疲劳，提出“一天多走 10 里路，就使 10 里路内的人民早解放一天，自己疲劳算什么”的时候，王司令员说：“很好，1 军同志的话有代表性，代表了整个部队的思想主流。要使群众早日解放，行军疲劳算得了什么？流血牺牲也值得。战士们这种思想，表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发扬、普及这种先进的思想，这些战士的思想境界很高，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王震司令员接着说：“我常说，部队就是要练出两套本领，一是能走路，二是能打仗。不能走路的部队，往往打不好仗；能走路不能打仗当然也不行。谁都知道打仗会有牺牲，谁听说过走路会走死人的。正相反，走路好，行军快，不掉队，就可以减少许多伤亡，取得很大胜利。特别是追击战更是如此，谁走得快谁就胜利。我们现在就是如此，我们要是走慢了，敌人跑散了，那就歼灭不了敌人，就要误大事！”

汇报时，有的宣传部长说：“有些人对进入回族区因受传说影响而感到为难……”，王司令员插话说：“这不能怪战士，我们的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去。”

说到这里，王震问孙主任关于民族政策的材料发下去没有，孙主任说各军都有材料。王震接着开导大家：“清朝同治年间回族造反，是清廷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逼出来的。民国年间回族造反也是如此。我人民解放军西进，消灭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军阀马步芳，却是解放广大被压迫民族群众的，这完全是两码事，有人说回族老太婆会拿起菜刀杀人，那是回族造反时对付反动统治的。我军纪律严明，回族群众会热烈欢迎我军的。至于在长期反动宣传欺骗下，一些回族群众不了解我军，那就要靠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搞好两个普遍宣传工作：一是在军内要普遍深入地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宣传，不要漏掉一个人，务使人人皆知，自觉地执行政策；二是进入回族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后，每一个指战员都要成为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宣传员，人人动口，充分发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的威力。而对于残余的敌人和反动分子的顽抗，不管他拿刀拿枪，则一律消灭。要把两种情况分清楚。还要注意，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要和揭露蒋马反动统治的罪行结合起来。”

王震司令员的两次插话，使会议活跃起来。有的同志汇报，一些战士对进军西宁感到油水不大，不如参加围歼兰州马步芳主力。

王震司令员又插话说：“这些都是好战士，战斗的积极性高，这种情绪应该保护，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彭总指示要把陇青战役的作战目的与基本部署传达给每一名指

战员，使人人胸有全局，不打糊涂仗，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战斗自觉性和积极性。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彭总对陇青战役的部署是正确的、英明的。64军对付宁马，两个兵团攻占兰州，兵力都够用了，我左路军1兵团3个军直捣西宁，是很重要很厉害的一着棋。我左路军进占马步芳的老家，就给固守兰州的马步芳以很大威胁；我军向西进入青海省，迁回到兰州守敌的西南侧后方，就会动摇马步芳固守兰州的决心。如果兰州守敌西逃，那就几路大军在追击中歼灭。不管哪种情况，都对我们有利，把这些都给大家讲清楚，战士们就不会有异议了。”

会议只开了半天，但大家都感到，心里的许多疑点经王震同志一点拨，烟消云散了，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下午，王震专门找1军宣传部长刘瑞芳谈话，问了部队的情况。他说：“1军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是贺老总亲手带出来的，既能打仗，政策纪律执行得又好。你做宣传工作，就要注意用这些教育部队，使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我想给你提个建议，你们的贺炳炎军长是一位著名的老战斗英雄，是不是以他的英雄事迹为主，写一个剧本，经常演出，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你看行吗？可别小看演戏，《白毛女》、《穷人恨》这些戏对部队起了多大教育作用啊！俘虏兵解放后一诉苦、一看戏，立场很快就端正了，打仗就成了英雄。”

王震司令员的讲话，很快逐级传达到部队，对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为了集中力量首先歼灭青马，我野战军各路部队于陇东追击作战以后，进行了短时间休整补充。对部队深入进行了

消灭青马的政治动员。尔后，第 1 兵团部队从秦安出发，开始向临夏进军。

8 月 12 日，我第 1 军在第 2 军协同下首先向陇西攻击前进，消灭守敌 120 军，该敌向西逃窜，陇西当日解放，军侦察分队俘敌自卫队 200 余人。

15 日，第 1 军解放渭源，第 2 军解放会川，兵锋直指临洮。沿洮河布防的敌临时编凑而成的骑兵部队不堪一击，渡洮河西窜。我第 2 军 16 日解放临洮，国民党县长亲自率自卫队 300 余人向我军投诚。第 1 军协同第 2 军迅速抢修了洮河浮桥。

21 日，第 1 军尾随第 2 军渡过洮河，向宁定（今广河）进攻，守敌骑兵 2 旅向临夏溃逃。1 军副军长兼 2 师师长王尚荣当即命令 2 师前卫第 4 团团长周忠甲、政委刘伯棠率部队追击。经过勇猛战斗，俘敌 300 余人，另 1 个排向我投诚。

23 日，第 1 军继第 2 军之后进抵临夏及其以东地区。同日，军侦察分队进至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永靖县城。接着，第 2 军亦进至黄河南岸另一重要渡口循化。第 1 兵团一部进占马家老巢临夏及其黄河南岸重要渡口，矛头指向西丁。

这是彭德怀、王震布下的一着妙棋，直到此时，马步芳才如梦初醒，大为震动，不得不从兰州抽调骑 8 旅回青海担任守备。我军从而粉碎了马步芳以新编骑兵军从侧背夹击我军的企图，保障了进攻兰州部队左侧的安全，增加了马步芳对其右翼和西宁的顾虑，对攻克兰州歼灭青马主力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第 1 军 2 师于 23 日从临夏进抵永靖，分驻县城附近和黄河南岸村庄。这时，我野战军主力第一次进攻兰州未获进展。彭总从进攻兰州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情况设想，决定第 1 兵团在临夏地区待命，一面做渡黄河直取西宁的准备，一面做参加围攻兰州的准备。这时，2 师从军通报得知：马步芳为了增强西宁的防御力量，从兰州调骑 8 旅回青海；在永靖黄河北岸进行防御的是新编骑兵军部分力量。黄河北岸守敌不断向黄河南岸射击，威胁我军安全。

面对以上情况，王尚荣意识到第 2 师作为军的前卫，必须对黄河北岸的敌情和渡河的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和准备。特别是天险黄河，是我军开进中最大的自然障碍，在有敌防御下强渡，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认真对待，及早准备。

永靖渡口原来有一座铁索桥，还有 20 多只木船。在我军进军临夏时，马匪为阻止我军过河，把铁索砍断，船也烧了。

1 军贺炳炎军长、廖汉生政委决心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渡过黄河：以军炮工团工兵营和师工兵连架浮桥。但黄河流速很快，船只又少，浮桥能否架成尚无把握。所以，同时组织了大量皮筏过河。

黄河上游甘肃、青海一带群众用的皮筏，通常是十来个羊皮筒子扎成一个长方形的筏子，由一个水手驾驶，可以坐五六个人，几个皮筏连在一起，可以加大载运量。根据分工，司令部参谋人员主要组织工兵分队架桥，政治部人员主要向当地群众征集皮筏。军师领导不断到架桥工地和准备皮筏的渡口检查督促。

一场紧急架设浮桥的战斗开始了。干部、战士深深懂

得，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决心不惜一切牺牲把桥架通，渡过黄河，向西宁挺进，解放青海。

在架桥地段，干部、战士和当地老乡一道，运来了架桥的器材，当桥顺利地架到 200 米处时，工兵班长安国楚在桥上用电话激动地向首长作了报告，首长们听后十分兴奋，并立即指示 6 团迅速做好渡河准备，待桥架通后，立即渡河。

不料，意外的险情出现了，当桥架到河中心时，突然被一股急流把铁链冲断，工兵班长安国楚和几名战士被河水卷走了。一天一夜后，安国楚被河水冲到 15 公里外的一片沙滩上，被回族群众搭救后返回部队。安国楚回来了，但架桥工作仍困难重重，进展缓慢。首长们为一分一秒过去的宝贵时间感到万分焦急。

怎么办？离上级决定渡河的日子不到两天了，时间非常紧迫。在这紧要时刻，王尚荣等首长看到架桥的任务难于实现了，果断地决定，想办法制做羊皮筏子，以筏代舟，实施强渡。

正在忙于作渡河准备的时刻，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来到了黄河边上，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完成任务，并命令 9 月 2 日中午渡河。

全体指战员个个斗志昂扬，争分夺秒地做好了强渡黄河天险的准备。前卫团 6 团团长易积贵，政委冀春光召开了部署强渡黄河的会议，命令 1 营在左，2 营在右，团直、3 营随后，以 2、4 连为第一梯队，以 2 连为主攻，迅速地渡过黄河去。部队的骡马则集中在一起，由几个水性好，身体棒的小伙子，抓住带头马的笼头下水向对岸游去。

老船工一桨连一桨地拼命划着，冷风扑面而来，波涛高

如小山，小筏子在波峰浪谷中上下起伏，波浪冲得筏子剧烈地晃动。

当筏子快驶近河对岸时，突然，“砰、砰、砰”，一阵枪响，盘踞在对岸的守敌向我渡河分队射击。

敌人的突然袭击，被我早已准备好的重机枪手接连几个点射压了下去。

这时，2连全体指战员奋力强渡，迅速地靠了岸。战士们在连长狄满栋带领下向北岸的敌人直扑而去。不一会功夫，只见敌人溃不成军，四处逃散。

前卫团胜利地渡过了黄河天险，掩护了大部队胜利前进。

强渡黄河天险的胜利，为青海的解放打开了大门。

1兵团开进青海的路途中，在王震的布置下，抓紧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和爱民教育。因为部队就要进入青海了，而青海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分，又是青马统治达40年之久的地方。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纠纷，民族隔阂很深。回族人民长期受马步芳欺骗宣传的影响，生恐我军“杀回灭教”、“共产共妻”。因此，如何遵守民族政策，取得回族群众对我军的信赖，就成为继续西进能否胜利的大问题。

1兵团党委明确向全兵团提出，向西宁进军，首先是军事进军，同时也不能忽略宣传队、工作队的的作用，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以西北局编发的《回民工作手册》、《回民风俗习惯》为教材，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要求部队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到哪里；不准队伍进入清真寺；不准借用回民的锅、碗、瓢、勺，做饭及饮水尽量用河水，如用回族群众的井水，首先征得群众的同

意，把手洗干净，再用群众的工具汲水；宿营要在无群众居住的院子，自觉保护群众财产，不准烧群众的柴、吃群众的粮和菜；对被俘虏的回族官兵，要严格执行不杀、不打、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的规定；按照回族的风俗习惯，给回族俘虏另外做饭。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和工作，指战员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西进途中，各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使进军得以顺利进行。

2师5团8连进入王家嘴时，有许多群众赶来欢迎，其中一位叫王成华的老汉亲热地说：“你们可来给咱们汉人报仇了，民国17年回族造反，杀死了我的父母，21年，又杀死了我的妻哥，咱们汉人受回族的欺侮多少年了，这一下老天爷也睁开眼了。”

班长姜崇仁上前耐心地向他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老人家，咱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打天下的，不管汉族、回族都要解放。马步芳向汉族派款抓丁，不是向回族一样派款抓丁了吗？过去回汉闹纠纷，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杀过去，这都是历代反动王朝和蒋介石、马步芳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利用民族矛盾造成的。解放军打倒蒋介石、马步芳，既是给汉族人民报仇，也是给回族人民报仇，咱们回汉人民本来是一家人嘛，应该团结起来，再不要闹民族纠纷了，齐心协力地支援解放军，去消灭马步芳，闹翻身求解放。”

王成华老汉听了他的话，觉得在理，十分服气地说：“好好还是咱们解放军好。”

在一旁的许多群众也连连称道说：“这就好了，老百姓谁愿意多伤人呢！盼着你们早日打倒蒋介石，消灭马步芳，叫咱们老百姓都得到解放。”

一天，6团3连行军30公里，宿营在只有一户人家的马家庄。户主马占彪是回族，他听说解放军要从他家门口经过，吓得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送到山沟里躲藏起来，家里只剩他和老伴看家。门紧紧地关闭着，3连的同志去叫门，他在里边不应声，几个战士说：“这一家大概是回族，不了解咱们，心里害怕，所以不开门，咱们就在外边露营吧，不要打扰他了。”说罢，战士们就自动离开大门到墙角下有秩序地放下背包休息了。

马占彪在院内听到战士们说的话，心里有些纳闷，他想，马步芳说解放军来了，要杀回灭教，怎么这个军队这样守规矩呢？正在这时，3连指导员又上前叫门，马占彪不由自主地应了声，指导员隔着门向里边解释道：“老乡，不要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不打人、不骂人、不糟害回族群众，我们是遵守你们的规矩的，请把门开开吧。”

马占彪听后就的大门拉开，让老伴把自己的四间房子腾出来叫部队住。

战士们看到这俩位老人还有些怕，就说：“我们在外边休息也一样，不再麻烦你们了。大家还是没有进房去。

老婆婆看到腾开房子都不住，便走出来说：“这样的好军队我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是规矩。”说罢，她就进屋烧了一大锅开水，盛出来让战士们喝，战士们就主动地向这俩位老人做起了宣传工作。

3班新解放战士马林州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向马占彪夫妇

说：“我也是回族，马步芳把我抓了丁，解放军解放了我，我亲眼看见解放军真正是人民的军队，对咱们回族是保护的。我们这一次到青海来就是为着解放青海人民的，叫回族再不受马步芳的压迫。”

马占彪听了，十分后悔说：“我们这里的人受了马步芳的骗了，他说解放军不准信教，看见回族人就杀，把我们吓坏了，这回才知道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正在这时，准备做饭的炊事员在院里的柴草堆里，发现藏着 3 袋面粉。副班长石余山就对马占彪说：“老乡，这 3 袋面粉是你家的吧？快拿回屋里去，别丢失了。”

老婆婆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十分动情，一边擦着自己湿润的眼睛，一边说：“解放军太好了，要是马匪看见，早抢去吃了。马步芳的军队跑的时候，向我家要粮，一次要了两石多，还要了两千斤草，不给就打，这 3 袋面，是我们藏在这里的，你们要迟来几天，老百姓就没法活了。”

接着，老两口合计了一阵，由马占彪到山沟里把儿子和女儿都叫了回来。3 连就在院外露营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部队要出发了，马占彪一家依依不舍，拉着战士们的手说：“你们再路过这里，一定到我家来。”

2 师 5 团 2 营机炮连宿营在一个村子里，2 班的房东藏在外边没回来。排长任瑞祥一进院子，看见院中梨树上的梨子快熟了。

2 班的同志经过一天的行军，饥渴交加，围坐在梨树下，羡慕地说：“树上结了这么多梨子呀！”

任排长从战士的言谈里，意识到了话外音。于是，立即把树上的梨子挨个数了一遍，然后，对班长石天才说：“这

棵梨树，就由你们班负责，我已经数过，树上的梨子总共有 104 个。”

石天才认真负责地把梨子数了一遍，不多不少，正好 104 个。

夜里，院子里人来人往，战士们轮流站岗放哨从树下经过，谁也不肯动梨树一下。第二天，部队继续向西宁挺进，任排在出发前来 2 班检查群众纪律，又把树上的梨子数了一遍，仍是 104 个，一个也不少。

18 团在翻越巍峨高耸的达里加山后，又疾进了 25 公里，赶到宿营地白喜仁家村时，天已黑了。

房子分好后，运输排的同志们把驮子一卸，把牲口拴在院内树上，一屁股坐下去，疲乏得再也不想动了。

2 班长孙方安把牲口拴在树上以后，摸摸索索地拿出绳子把行军槽吊好，倒上草料，调匀了，小心地去把屋门推开，点上了灯，把同志们喊进去休息。

由于好几天晚上喂牲口都没有睡好觉，今天又走了 60 多公里地，腿疼膀酸，支持不住，一上炕，战士们掏出烟袋锅，抽下一袋，就呼呼地打鼾了。

第二天天亮，两个不安分的骡子在树下打起架来，你踢我咬。

2 班长和王兴振从酣梦中被惊醒，他们翻身起床，赶忙拉开牲口，揉一揉眼才发觉梨树上的梨子被震掉了十多个，被牲口踩得稀烂。

王兴振赶忙找来簸箕，把掉下的梨一个个地拣起来盛进去，照着 2 班长的意思，等老乡回来赔钱道歉。

不久，房东老汉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拄着拐杖从山

里赶了回来。踏进了家门，只见院内一片宁静，地上扫得干干净净。

2班长见房东回了家，急忙端着簸箕走到房东面前，歉意地说：“昨天晚上我们不小心，把牲口拴在你家梨树上，牲口打架，震下了 18 个梨。这簸箕里的钱是作价赔你的。”

老汉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十分感动地说：“给我看家还没有感谢哩，满树的梨落下十来个算啥！”

“你们庄稼人，把梨从小盼大、从大盼熟，指望卖钱花，我们的牲口糟蹋了梨，你不收钱，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就这样，我们还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哩。”

2班长和王兴振一面自我检讨，一面劝说着老乡收下了钱。

正是通过这点点滴滴的小事，使广大回族群众认识了解放军，密切了军民关系，打破了马家军的反动宣传，使我军的大进军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章 飞渡关山下西宁

8月26日兰州解放。当日，1兵团接到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命令。

1军从永靖渡黄河，取道民和、乐都，沿湟水以南的山区小道，直取西宁；2军在王震司令员的直接率领下，由临夏西进取循化，夺取古什群峡桥、过黄河，取道甘都、化隆攻击前进，这就形成了两股强大铁流钳击西宁的态势。

1军贺炳炎军长、廖汉生政委为防止马步芳残部回窜其老巢青海，在组织大部队迅速渡河，昼夜兼程西进的同时，抽调军直及1、2、3师4个骑兵侦察连和9个团侦察排的骑兵班以及各师侦察科长，各团侦察参谋等共600余骑，由军侦察科长孙巩率领，组成军的先遣侦察部队急趋西宁，查明进军西宁沿途敌情、道路、地形等情况，为我军夺取西宁开辟前进的道路。

永靖渡口北岸驻有敌人的防守部队约2个骑兵连，先头营在2师前卫团的大力掩护下乘筏渡过黄河，击溃了防守的敌人，控制了渡口。先遣侦察部队跟着续渡，先过去2个骑兵连，上岸后立即参加战斗，将北山敌骑击溃。接着，侦察部队过王家大山、杨家大山，进入青海省民和县境内，沿途碰上不少溃逃的敌人散兵。

孙巩一面派侦察参谋询问残敌向西溃逃情况，一面调查前进中的地形道路。边走边侦察，马不停蹄，人不卸装，翻越高山峻岭，昼夜兼程。真是“千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

自秦安出发，连续行军作战 20 多天，有的马掌跑掉了，有的战马累死了，孙巩的一匹乘马也跑死了。鉴于部队过度疲劳，有的师侦察科长建议休息一天。

孙巩发电请示军首长，回电大意是不怕牺牲，不顾疲劳，不惜代价昼夜前进，要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

从我军当时掌握的情报看，兰州解放时，马步芳残部尚有 2 万多人向河西走廊溃退，82 军残部从永登、互助、民和、乐都向西宁回窜。先遣侦察部队的任务决定了侦察队必须赶在敌人的前面，不然就会贻误战机。

接到军的指示后，孙巩连夜召集干部开会，传达军首长指示，向全体指战员进一步做好思想动员。30 日下半夜又继续向李二堡、塘尔垣、新民、中堡前进了。

侦察队于 31 日进入了乐都县的中坝、瞿昙。这里有个大寺院。在寺院附近和敌人 1 个骑兵连遭遇，不到半小时，就缴了敌人的械，还缴获了几十匹马，补充给了各连。再向西，沿着湟水南岸的川谷地带奔驰，过了大峡，临天黑在平安驿宿营。孙巩的指挥所设在南村，镇上留了 1 个排，大部分兵力隐蔽在平安驿东西的几个庄子里，避免过早地暴露目标。

到达平安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非常高兴，原来预计和 2 军先头部队在这里会合，虽然这时他们未到，但我们的骑兵却顺利地逼临了西宁的大门。不过作为一支小部队，远主力有两三天的路程，孤军深入，能不能乘敌空虚，袭取西

宁呢？

这天晚上，孙巩召集 1 师侦察科副科长郝宏远， 2、3 师侦察科科长魏家祯、黄庭钦和各团的参谋们开会。

大家一起分析了形势：当时西宁敌人兵力单薄，守备空虚，极为混乱。溃退下来的官兵大都互不相顾，各自逃命；而我们的指战员大都是抗日时期在冀中、晋北参军的老八路，久经战火考验，情绪饱满，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各个连队都能独立作战，还有科长、参谋亲自指挥，就是遭遇意外，也能应付裕如。经过分析判断，大家一致赞同奔袭西宁。

决心下定后，干部立即深入下去，传达任务，进行战斗动员。侦察员们忘记了疲劳，纷纷投入战斗准备。当夜，孙巩向军首长电告了西宁敌情及先遣部队相机占领西宁的作战计划，并建议军主力加速前进。

3 日拂晓，侦察队沿公路疾驰 20 公里，于 10 时前后分两路包围了乐家湾，占领了飞机场，敌机场人员全部投降，侦察队缴获了 3 架飞不动的飞机。

从机场投降人员口中了解到：马步芳及其亲族心腹于 8 月 27 日、马继援于 9 月 1 日先后从这里乘飞机逃跑了。在这里侦察队还了解到骑 8 旅虽已窜回西宁，但在大肆掠夺后又于 9 月 2 日向西溃退。

9 月 3 日中午，侦察队稍事休息，即策马向西，于下午两点多占领了西宁市东关。西宁城只有弃械溃逃的散兵游勇和伪政府一些官员，并无部队防守。

孙巩立即作出部署：2 师侦察连占领西门、南门一带；3 师侦察连占领小桥工厂区；1 师侦察连和军直侦察连占领

东关的周家泉马步芳公馆、湟中大厦、湟光电影院、青海实业公司等处，指挥所设在湟中大厦的楼上。侦察队急行军，都是轻武器，所带弹药有限，所以孙巩立即命令各连控制弹药库。

先遣侦察部队经过几天急行军，疾驰 300 多公里，终于进入并占领了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宁。

侦察队刚把部队部署开，治安维持会的人员就来了。孙巩不摸底，心中无数，在城墙、大街作了警戒部署以后，才同几位科长、参谋随着他们到了马步芳的省府大礼堂，会见了维持会的人员。这些人大都是伪参议员、地方绅士，还有伪蒙藏委员会和商会的人员。他们说，在我军进城之前就成立了这个组织，是维持社会治安的。

孙巩说：“好嘛，现在我们先头部队来了，大军随后就到，就请你们帮助维持社会秩序吧。”

孙巩向他们讲了话，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和两路大军进军青海的形势，要求他们保管好现有的一切资财、档案，为人民做点好事，动员商人照常开门营业。夜晚 12 点戒严，禁止通行，违者严惩不贷。

晚上，侦察队基本上没睡觉，整班整排地在城中和城北巡逻。我军初来乍到，情况不明，没有见到一个地下党员前来联系，主力部队离此尚有一两天以上的路程，不能不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夜很深了，一个自称卢德的人来到指挥所，说他是王震司令员派来的劝降联络员，先于侦察队到西宁。他报告了上五庄及大通桥头地区尚有 82 军残部约两千人和几十名军官，正在那里集结，有回窜西宁的企图。城内市民担心入城部队

少，怕敌军回来抢劫。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当晚，孙巩把先遣侦察部队占领西宁的情况和部署，以及在大通桥头和上五庄地区的 82 军残部有回窜西宁的企图，向军首长进行了报告。

这时，城内有无暗藏的敌人，城外的敌人又在集结。侦察队于进西宁的第二天，调整城防部署，将 3 师侦察连大部调防北关，并用 1 个排守小桥，2 师侦察连防守西关和南门，向大通、上五庄方向派出了侦察骑兵，还加强了重点地区的弹药准备。

为了宣传群众，安定民心，侦察队还利用湟光电影院的喇叭，向全市正式宣布，西宁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了，马步芳统治青海的历史永远结束了，两路解放大军正向西宁挺进，以安定民心。同时，侦察队还通知维持会征集汽车，以备军用。维持会不敢怠慢，很快就送来了 5 辆卧车，孙巩分配给各师侦察科长使用，指挥所也留了两辆。

当时，残敌仍在向西宁流窜，侦察队急需车辆接运主力到达西宁，指挥所立即让维持会帮助征集汽车，不管军用、民用，所有车辆和驾驶员限时报到。天黑时，报到的大小汽车即来了好几十辆。之所以这样做，因为车在敌人手里，他们会用以拉部队打我军，相反，控制在我军手里，我军就可以用来接运主力部队进城。这是保障西宁人民安全的关键性措施。

1 军大部队是 9 月 6 日到达西宁的。第 1 兵团指挥部稍后到达。当时兵团司令员王震率领的兵团部住在“实业公司”。兵团部的代号为山岛部。1 军军部开始住在马步芳的密室，以后搬到周家泉的马步芳公馆。军部的代号为黄海

部。³师师部住在文化街的“丑家公馆”，师部的代号为武昌部。“丑家公馆”是丑惠瑗、丑惠瑛姊妹二人被马步芳霸占后，专为其修的公馆，故名为丑家公馆。

就在 1 军到达西宁的当天，廖汉生政委喜得一千金，廖政委当即赐名“涤青”，取涤荡青海一切污泥浊水之意。

大部队初到西宁，和原来想象的城市景象相差很远。给人的是一种萧条破败之感。马步芳父子及其亲信乘飞机逃跑后，旧政府即行瓦解。西宁由于长期在马步芳的统治之下，没有我党的地下组织，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当时西宁一片混乱。有人乘混乱之机，到旧政府的机关、企业乱抢东西，把皮沙发上的牛皮都剥去了。直到我军大部队赶到西宁时，仍发现一些人从旧政府机关、马步芳的公馆中往外搬东西。我军不了解情况，问谁让他们搬东西，他们不说话，这才知道是抢东西的，被我军立即制止。

当时的西宁都是低矮的土房，唯一高大的建筑物就是东关的湟中大厦，也只是砖木结构的楼房，其中有一个不大的舞厅是供马步芳一伙专门享用的。街道都是不宽的土路，汽车会车都困难，遇到雨天，泥泞得无法走路，东西及南北街路面高低不平。从东大街向西缓上坡，大十字的西街口有个魁星楼，上头装个广播喇叭，经常有人聚集在那里听广播。

城墙是用很大的砖砌起的，有东西南北四道城门。全城没有自来水，吃的是井水和泉水。当时的东门、北门外，均有不少泉水，经常有群众在那里挑水吃。房子里没有取暖火炉，都是用马粪和柴草秸煨炕，有的炕上还放火盆。群众的衣着比较古旧、简单。棉衣絮的是羊毛。不少人戴簸箕形白毡帽，穿手工做的牛皮鞋，鞋底鞋帮一张皮子包起，里面填

的草。十多岁的孩子没有裤子穿，太阳出来蹲在窗台下晒太阳。当时西宁的公馆很多，有马步芳公馆、三大公馆、陈家公馆、丑家公馆、祁家公馆、李家公馆等。这与许多市民没有房子住形成了鲜明对比。

青海和内地的季节气候差别很大。5月1军从太原前线向西北进军时，沿途的晋中、晋南和关中地区的小麦已快收割完了，经过将近4个多月之后，青海的群众还在收割青稞和小麦。群众割麦后，气候很快就冷了下来。

当时我军只有单衣，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被，更没有毛毡、褥子，战士穿上衣服冷，睡下也冷。由于当时部队进军的速度很快，后方的物资运不来，冬季到了，大家还没有棉衣，马步芳仓库内的棉衣很少，不够每人一套，有的发了一件棉袄，有的发了一条裤子，还有的发了一件棉大衣。在当时就算不错了，身上也觉得暖和多了。但是一周以后，上级动员把所有棉衣收起来，支援2军进新疆。干部战士服从全局，没有一点怨言。

刚刚暖和了几天，一下又脱去棉衣，比原来更冷了，不少战士冻伤了手、足。

连队开始没有钟表，站哨都是点香，一柱香换一次哨。进城后买了马蹄表，不少人也不认识。有个连长是晋西北根据地农民出身，有的战士反映，夜间1小时换一次哨时间太长，他在点名时说：“你们不要那么死板，不一定非站够1小时才换一次哨嘛，站70、80分钟就可以换了”他把1小时当作100分钟了。以后大家把这件事常当笑话讲。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寒冷，上级给每人发了6斤羊毛，发动大家捻毛线，织毛衣、手套和袜子。那时一到休息时

间，同志们都晒着太阳捻毛线，大家把次一点的羊毛絮了被子，晚上睡觉再不冷得当“团长”了。

为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王震司令员准备在东关清真大寺院内向回族的阿訇以及上层人士讲话。

参加会议的人陆续来到清真寺，有留长胡须、头裹白布的老阿訇，有穿着比较干净、讲究一些的上层人士，也有做小买卖的回族群众。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站在院内说话。¹军宣传部长刘瑞芳来了，便有七八个人围拢上来，先道辛苦，称赞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绩，接着便提出一些问题来。

“我们回族出了个坏种马步芳，他反了一辈子共产党，解放军消灭了他的队伍是应该的。但可千万别把我们姓马的都当成马步芳一家，我们是两回事。”

“共产党、解放军是不是还闹共产，把有钱人家的财产都分给穷人？”

“马步芳的兵多是抓壮丁抓去的，现在打散回家的不少，到处藏藏躲躲，对这些人怎么办？”

“共产党还让不让我们作礼拜？”

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直截了当，你一句，我一句，东一句，西一句，躲躲闪闪。看来，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还不了解。刘瑞芳一面解除着大家的思想顾虑，一面不断按党的政策进行解释。这时开会的已来了 400 来人。

大家正在谈着，王震司令员到了，大家热烈鼓起掌来。一位兵团领导向群众作了介绍。王震司令员便在一个高台上发表了讲话：“各位父老兄弟，你们都好。我人民解放军奉

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向西北进军，消灭了蒋介石、马步芳的反动军队，就是要解放受苦受难的各民族同胞们。”

“回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跟汉族都是兄弟。蒋介石实行大汉族主义压迫你们，我们就打倒他，取消大汉族主义。马步芳投靠了蒋介石，干尽了坏事，他也是压迫回族同胞的，现在把这些骑在各族人民头上的恶魔打倒了，我们才能过好日子。”

“马步芳说他反对共产党是为了‘保族保教’，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是保他的反动家族永远压迫剥削人民。”

“共产党的政策是讲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在回族、藏族人民跟汉族人民一样，都翻身解放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人民政府以后还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以后大家愿意礼拜的就礼拜，愿意念经的就念经，只要遵纪守法，政府就一律保护。”

王震司令员深入浅出的讲解，使群众越听越有兴趣。在听到礼拜念经有自由时，爆发了热烈的掌声。王震司令员接着就对投降军官士兵的政策、对工商业的政策又分别作了解释，号召各界人士各安生业，万勿听信谣言，自相干扰。群众又是一阵鼓掌。

王震司令员接着说：“现在全国的形势很好，各路解放军正在西北、西南各地举行规模巨大的胜利进军，全国解放已经在望，青海全省和新疆的解放正在眼前，希望各族各界人民协助解放军完成这一伟大事业。”

王震司令员最后严肃地指出：“听说有些马步芳残余军官，贼心不死，妄图顽抗，有些不法分子也阴谋勾结反动军

官，蠢蠢欲动。对待这些与人民为敌的坏蛋，我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给以彻底消灭，决不宽待。我再说一句，谁要敢于暴乱，等待着他们的，就是灭亡。”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王震司令员的讲话结束了。散会的人们在议论着：“真不愧为名将，话不多，说的又透彻，又有气派。那些不识时务的不会有好下场，王司令员说出口，就不会饶他们的。”

下午，刘瑞芳拿着整理好的王震司令员的讲话稿，去兵团政治部找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他看了看说：“可巧王司令员找我谈工作，咱俩一块去吧。你别拘束，王司令员可好接近啦。”

王震司令员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接待了他们，让他们喝茶吸烟。他在屋内踱来踱去，然后坐下来：“我想跟你们谈一件事，就是提高警惕性问题。部队的作战精神丝毫不能削弱。2军要北上河西走廊准备向新疆进军，新疆陶峙岳、包尔汉可能起义，不起义就要打进去，就是起义了也会有散匪暴乱，也不能丧失警惕。”

王震司令员越谈越有精神，他喝了几口茶水转向刘瑞芳说：“1军留在青海执行任务，也要特别注意提高警惕性。在兰州只歼灭2.5万多敌人，一路西进和解放西宁消灭残敌合在一起也不过3万多，还有几万青马军被打散，有的跑回家了，有的隐蔽起来，里边有大批反动军官，武器也还在。以后总有一部分反动家伙会起来暴乱，万万不可麻痹，麻痹要吃大亏。千万不可认为我军占领了城市就万事大吉了，剿匪作战是少不了的，一定要提高警惕性。”

第三章 王司令派出劝降团

早在 1 军大踏步向西宁进军的同时，王震司令员已在运筹着劝降问题。他在指挥 2 军解放了甘肃临夏后，就让人寻找一位名叫马丕烈的人。

临夏解放后的第三天，马丕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怀着试探的心情，带着妻儿从乡下回到了县城。

回到家里，马丕烈感到十分意外。尽管院子里住满了解放军，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有一位解放军参谋长住在楼上。当他知道马丕烈回来时，便热情地对马丕烈说：“我们正在找你呢！你回来太好了。”说着，立刻用电话向王震司令员报告：“我们的房东回来了。”

马丕烈虽然并不害怕，心里却怎么也坦然不下来。他一边喝茶，一边回顾着自己的过去，预卜着自己的未来：自己和马步芳有亲戚关系，1940 年前还当过国民党 82 军的少将副官长，后来又当过伪青海省政府的财政厅长，还当选为伪国大代表，去南京开过会……

突然，一位解放军干部走了过来，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马丕烈的沉思。

“马丕烈先生，王震司令员派我来接你，请你马上动身。”马丕烈立即下楼，随这位同志去见王震司令员。

司令部设在临夏的“东公馆”。当他们来到兵团司令部时，王震司令员很客气地把马丕烈让到屋里，招呼马丕烈坐下后，爽直地对他说：“丕烈先生，你对解放临夏是怎么个看法呢？”

“很及时！很好！我很高兴！完全拥护，欢迎！”马丕烈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说实在的，马丕烈完全没有想到王震司令员对他竟是这样称呼，也完全没想到他们的对话竟是这样一个开头，马丕烈有些慌乱。

在镇静下来缓缓气之后，马丕烈对王震司令员说：“韩起功在临夏抓壮丁，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青年都被抓去当了炮灰，老百姓的庄稼烂在地里收不回来，日子难过得很。现在解放军来了，临夏各族人民解放了，这是大好事。”

王震司令员听完他的话，笑了笑说：“你是开明人士，在西安时我们就知道你。”

他担心马丕烈听不懂，又举例说：“在陕北有个李鼎铭先生，就是一位开明人士，他很进步，精兵简政的意见就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评价很高。”

王司令员的一席话，使马丕烈心里更加踏实了。接着，王司令员还让马丕烈看了墙上贴着的一张人民解放军的大布告。这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署的“约法八章”。王司令员边指边念着，有时还讲解一下。王司令员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蔼可亲的态度，使马丕烈非常感动，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王司令员给马丕烈讲完了“约法八章”后，接着，又用

商量的口气问马丕烈：

“丕烈先生，你可不可以去兰州给马继援说说，叫他不要再打了。他能打掉第 1 野战军吗？就算能，我们还有第 2、第 3 野战军。他们都可以腾出手来了。你与他有亲戚关系，你考虑能不能去一趟呢？”

“很好，能去。”马丕烈爽快地回答了他。

王司令员又十分关切地问：“你去后，他会不会为难你？”

马丕烈很有把握地回答：“我认为不会，即便是有点为难，也只在我一个人身上。没关系，您的话我一定带到。”

王司令员说：“那就好，你回去准备一下。什么时候走，你明天来联系。”

第二天，马丕烈准备好后，去见王司令员。王震说：“兰州正打得激烈，恐怕你过不去，我们再看看，好通知你什么时间走。”

晚上 11 点前后，马丕烈已经睡下了，参谋长派人通知马丕烈：“王司令员请你去一下。”马丕烈立即穿好衣服，与接他的参谋一同乘车前往兵团司令部。

进屋后，王震司令员兴奋地告诉他“马丕烈先生，兰州已经解放了。狗娃山首先攻开，青马残部由铁桥撤退，我军火力严密封锁，敌人损失非常惨重。东岗的敌军撤至焦家湾，还没有到桥跟前，就被我军歼灭，落入黄河的很多。马继援已经由永登跑到河西去了，兰州不需要再去了。”

兰州解放的那天晚上，王司令员又问马丕烈：“丕烈先生，你能同我们一起去解放青海吗？”

听说要解放青海，马丕烈立即回答说：“过去我在青海

做过事，认识很多人，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

王司令员说：“那就好，你准备去吧！”

第二天，马丕烈去司令部给王司令员推荐马良。马良是马步芳的叔父，如果他去青海，也能发挥作用。同时，马丕烈还建议选上两位汉族代表同去，因为在临夏过去有些事都是回汉一块办的，所以这样更合适。

王震司令员采纳了马丕烈的建议，并让马丕烈陪他到马良家里走一趟。在马良家里，王司令员征求了马良的意见，马良也爽快地同意了。

从马良家出来，王震同马丕烈一同乘车返回司令部。车上，王司令员用十分信任的口气对马丕烈说：“可以去两个汉族代表，看谁合适，你定就行了。”

后来马丕烈选了徐季直、祁子厚两人为汉族代表。这样，一个赴青海的劝降团就组成了。马丕烈向王震司令员作了汇报。王震司令员对这个代表团的组成很满意，当即通知参谋处写好了路条。

第二天，劝降团和王震司令员一起出发同去循化。王司令员特意让马丕烈和自己坐在一辆吉普车上。马良、徐季直、祁子厚坐在另一辆黑卧车上。路不平，汽车不好走，越过达里加山，来到俄家庄时，天已黑了，王司令员一行就在附近一个撒拉族老汉家里住了一夜。

次日，王司令员一行到离循化还有 2.5 公里的地方时，遇到了一条约十几丈宽的深沟，沟里架的木桥已经被韩起功的部队在撤退时烧毁了，解放军正在抢修，汽车在短时间内无法通过。

王司令员立即向跟前的解放军要了几匹马，叫马丕烈和

他骑上，绕深沟，抄小路，一路扬鞭催马，往循化赶。

过了深沟，走进了一个荒凉大滩。在滩里走了半个小时光景，连一个人也看不见。

通过大荒滩，穿过循化城，来到了一个叫草滩坝的庄子。在这里见到了 2 军政委王恩茂。王震司令员将马丕烈作了介绍，大家没脱鞋便上了炕，一起研究向西宁进发的问题。

第二天，王司令员高兴地告诉马丕烈：“我们正在搭浮桥，桥修好了马上就过河去。”

但是，等浮桥修好，至少还要一两天时间。马丕烈心里很急，就向王司令员建议：“让我先过去吧！让我早点过河去西宁，争取时间劝说马步芳官兵投诚。”

王司令员十分赞赏马丕烈的积极态度，同意马丕烈先过去，问马丕烈河怎么过？

马丕烈说：“这儿附近有个察汗大寺庄，以前我在那里办过木料，渡口的水手们我熟悉，他们可以用木排把我送过去。”

马丕烈又说：“我打算让马良也去，再派两个军代表。”

王司令员对这些意见都同意，并派卢德参议和李骥参谋与马丕烈同去。

当日马丕烈 4 人一同出发，来到察汗大寺，找到熟人比西日阿訇。马丕烈叫他找来了两个水手，绑好木排，把马丕烈 4 人送过了河。

他们骑上马，沿着拉扎山，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来到了化隆县。

当他们又走了 15 多公里，来到三堂垭壑时，看见迎面

驶来了一辆大卡车，上面坐着马辅臣、沈海珊、马子乾等 20 多人，全是西宁的绅士。他们说，是来欢迎解放军的。马丕烈告诉他们：“大军正在过黄河，今天还来不了，和我们一块来了两个军代表，你们赶紧欢迎去。”他们听了，马上跑去请军代表上汽车。这时大家上了汽车，调头向西宁开去。

晚上 10 点多钟，马丕烈一行到了西宁。汽车直接开进了旧青海省政府。下车看时，院子内乱七八糟，破坏十分严重，甚至连椅子的座垫也被人偷走了。

这时西宁一片混乱，到处发生抢劫事件。马丕烈急忙派人找来了伪西宁市警察局的督察长。对他说：“你要赶快设法维持社会秩序，制止一切抢劫事件的发生！”马丕烈问他：“现在你能召集多少警察？”他说：“可以集合 30 多人。”马丕烈又问：“有没有枪？”他说：“有。”这样，就由这位督察长集合了 30 多名警察，暂时担任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

马丕烈了解到，在兰州战败后退到青海的一部分青马军官还在上五庄。早上，马丕烈找了两辆车，同马良、李参谋一起去上五庄。行至中途，看见散兵由北向南走，沿路胡乱放枪。马丕烈担心李参谋的安全，就打发马良陪李参谋返回西宁，自己一个人独自去上五庄找这些军官。

马丕烈来到上五庄，经过打问，才在马步芳的“洋楼”里找到了 82 军副军长赵遂和参谋长马文鼎、100 师师长谭呈祥、129 军副军长韩得铭和师长杨修戎等人。马丕烈向他们介绍了临夏解放的情况，宣传了解放军约法八章。然后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一切都还来得及。现在你们能集合多少人就编制多少人向解放军投诚，立功赎罪。尔后，愿

意回家的可以把枪枝弹药放下骑马回家。”

经过多方劝说，他们终于打消了顾虑，答应投诚。马丕烈便连夜返回西宁，向两位军代表报告了情况。他们当即写了证明。主要内容是：你们的行动很好，我们表示欢迎，你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将受到解放军的保护等。

马丕烈带上军代表写的证明，立即返回上五庄。赵遂等人见了证明后，非常高兴。

在上五庄，马丕烈还了解到三角城有一批正准备逃跑的官兵。马丕烈认为情况紧急，所以在安排好了上五庄的事情后，又急忙赶到三角城。

在那里，他见到了 190 师师长马振武、副师长马子俊、参谋长李少白，还有 82 军 248 师师长韩有禄等。在三角城还有一个骑兵旅，旅长是马英。

马丕烈首先给马振武、马英等人做工作，向他们宣传解放军的政策和解放军西进的形势。当他们接受了宣传以后，便把其他军官们集合起来，在门外的草地上围了个大圈，请马丕烈讲话。

马丕烈针对他们想逃往西藏的思想，开门见山地说：“有些人想走，可是走到哪里去呢？去西藏吗？我知道那里的情况，这条路确实不好走，进藏路上的土匪多得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生命，你们老婆孩子的生命，你们身上所带的财产，能保得住吗？”

马丕烈看有些人有所动摇，又说：“马英的那一旅人大多数都想回家，他们和你们最多跑过一两站都要开小差了。”

话刚说完，马振武就说：“我们可以听你的，愿意投降，但是，要你作担保。”

马丕烈连声说：“好，好 我可以担保。”他们的情绪立即平静了下来，马丕烈又说：“我马上去西宁向解放军代表报告，给你们按照上五庄的样子要个证明来。”

马丕烈回到西宁，把马振武等愿意投诚的情况向军代表作了汇报，他们立刻仿照上五庄的方式写了一张证明。

马丕烈去上五庄劝降之后，解放军 1 军 2 师政委颜金生、副政委杨琪良将李鸿恩叫去，让他第二天赴湟中县上五庄受降。

动身时，领导给李鸿恩组织了 5 个人：一个摄影记者，一个司机，一个负责收枪发路费，一个发放释放证。分工清楚后，5 个人即带了半麻袋白洋，合乘一辆大卡车，直奔上五庄。

太阳偏西了，从楼房里出来一个师级军官，发号施令，让大家集合，可是没人理他的茬，他长叹一声就进去了。

李鸿恩当即意识到他们的指挥棒已经失灵了，应该趁热打铁，再做工作。就对摄影记者说：“时间不早了，受降仪式怕不能举行了，我们得赶快把那些家伙弄回西宁，免得夜长梦多，再生事端。”记者同意了李鸿恩的意见，李鸿恩就立即让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集合。

李鸿恩的话非常灵，一声口令，他们蜂拥而来，李鸿恩又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就宣布每 10 个人站一排，到右侧放下武器，领取路费和释放证。当时，李鸿恩决定，每交一件武器，不论是机枪，卡宾枪，还是马刀，步枪都一律付给 3 块银元作为路费。马家军按照规定，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有的人交一件武器后，又拣了一件破烂武器来领钱。李鸿恩看出来，但无暇顾及，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照发 3 块银

元。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都高高兴兴地转身回家，有些人说路远要求把马骑回去种地，李鸿恩也都同意了。不大一会儿，就把 300 多人遣散完毕。

下级军官和士兵被遣散了，青马的中高级军官丧失了讨价的资本，也就驯服多了。李鸿恩把他们喊出楼来集合讲话，说明他们必须到西宁参加学习。他们互相看看，失望地表示顺从。这些人连同他们的警卫人员和行李，分乘李鸿恩他们缴获的一辆大卡车和一辆中型吉普。只有 28 师副师长张锡珍，因病卧床，实在不能坐车上路，李鸿恩就当面吩咐，病好了以后到西宁参加学习。后来，这个人在家养了一个时期病后，也到解放军官训练处参加了学习。

掌灯时分，李鸿恩他们离开了上五庄。因为路况很差，回到西宁时，夜已经很深了，但颜政委、杨副政委还在等候他们。李鸿恩扼要地汇报了受降经过，两位首长非常满意，赞扬他们胜利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

第四章 大坂山里歼残敌

在进军西宁中，1师1团三天两晚走了180多公里，硬是用“两条腿”追垮了敌人骑兵的“四条腿”。在西宁解放时，马步芳骑8旅和骑2旅的残敌，准备到大坂山、祁连山打游击等待反攻，为首的是马英、马呆呆、马成义等人。

1团根据群众报告和侦察兵侦察的情况，得知这股匪徒有200多人、200匹马、10挺轻机枪、5门炮，还有170多支枪。

贺炳炎军长、廖汉生政委接到1团的报告后，立即命令1团急行军100公里，向大通和大坂山马场追击敌人。

9月7日，1团10个小时行走50多公里赶到大通，之后1团又决定3营尾追敌人到大坂山马场。9月8日，1团10小时行军50公里赶到王家沟附近集结。路虽不远，但全是大小山峰，崎岖难走。9月的大坂山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战士们不怕冷、不怕累、不怕渴，急速行军，用“两条腿”和敌人的“四条腿”展开了比赛。团里的口号是：抓住敌人，消灭敌人。行军中，忽然一道河挡住了去路，水深流急，两岸陡峭。3营田文清营长带头跳入水中涉水而过，战士们也都跟着涉水过了河。

刚到王家沟，1团的侦察员俘虏了3个敌人哨兵。这3

个哨兵供出了马英等匪徒确实住在马场的消息。他们说，北山口有 1 个排的兵力把守，南山口是 1 个连约 40 余人把守，东西山口各 1 个班把守。

根据这些情况，1 团领导陈忠全等马上召集营、连长侦察地形；很快下定了坚决、全部消灭马英股匪的决心；大家一起研究了打法，布置了战斗任务。

激战之前，战士们既紧张又兴奋，求战情绪很高，都一心想干净、利落地全歼这股敌人。3 营命令 11 连于 9 月 9 日晚 21 点出发，急行军 21 公里绕到敌后，在 9 月 10 日早晨 5 点钟准时打响，以勇猛的动作攻占北山口阵地，截断敌人退路。全营就以 11 连的枪声为信号发起总攻。11 连出发后，各连也都按照营下达的作战计划分别行动。9 连的两个排于凌晨两点钟，悄悄地接近西山敌人 1 个班，准备在战斗打响后，迅速消灭这个班。9 连 3 排秘密接近东山敌人 1 个班，11 连打响后，坚决吃掉这个班。10 连 3 点钟出发接近南山口敌人 1 个排，战斗打响后，在 12 连、炮兵连、重机枪连、特务连火力掩护下，消灭敌人，抢占南山口。各连按计划进入预定地点。

9 月中旬的大坂山，寒风呼啸，冰天雪地，寒风一吹，雪花漫天飞舞。部队穿着单衣，战士们爬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的山坡上。手脚冻麻木了，就自己揉一揉，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战胜眼前的困难，彻底消灭敌人。

9 月 10 日早晨 5 点钟，11 连准时在北山口打响。顿时，山上山下枪炮声响成一片，冲锋号声，喊杀声回荡在整个山谷，惊慌失措的敌人乱作一团，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神兵天将突然而至。11 连以勇猛的动作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激战

十分钟，全歼北山口守敌，毙敌十余人，伤敌十余人，俘敌 5 人。¹¹连副连长王中仁腰部负伤，被炮弹震昏过去。醒过来以后让卫生员包扎了一下，又冲上阵地，带领战士打退敌人的反冲锋。各连也很快占领了敌人前沿阵地，一面修筑工事，巩固阵地，一面开展战场对敌宣传工作，山上山下到处是“缴枪不杀”，“不虐待俘虏”，“放下武器，保证生命安全”等喊话声。

经过 1 个多小时包围喊话，敌头目马英打着白旗来同我军谈判。马英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部队算起义，起义后编为青海解放军骑兵第 1 旅；第二，保持原班人马不动；第三，如果上述两个条件不行，暂停攻击，把部队从雪山上撤下来后再商量。

显然，这三个条件是缓兵之计。陈忠宝立即针锋相对地提出三条：一条是无条件地放下武器投降，不是起义；另一条是投降后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再一条是愿意回家的可以放回家。

最后，陈忠宝等人严肃地说，下午两点钟准时把队伍带到南山下，放下武器后部队离开 1000 米集合，然后由我军接管，不然的话，3 点钟我们准时开炮发起攻击，全部消灭你们，后果由你们负责。马英考虑了很长时间，迫不得已接受了条件回去了。

下午两点钟，马英、马呆呆、马成义等匪首带着 180 人，200 匹马，5 门炮，10 挺轻机枪，150 多支步枪，20 多支手枪，按指定的地点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了。不久，马英乘看守不备、逃跑了，继续与我军作对。

第五章 血战桥头

西宁解放不久，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军各师都分别组建了骑兵营。3师骑兵营营长由9团副团长周泽湘调任，副营长由黄庭钦担任，全营驻防大通桥头镇。

自从兰州战役马家军全军溃散后，其残余武装还藏匿在各地，他们当时纠集不起很多人，便采取“战马当耕马，武器埋地下”的策略，“待机而动”。经过一两个月的秘密组织、串连，开始四出伏击我基层政权干部，伏击我外出执勤的零星人员。西宁周围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形势。

针对这一形势，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4日致信彭德怀，明确指出：对青海马匪余党的叛乱，要予严重注视。根据这一指示精神，青海军队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1军根据西北军区的命令，调1师赴临夏剿匪，青海地区由第2师、第3师守备。

马步芳残余土匪认为有机可乘，遂于11月30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匪首马英逃回去又率土匪500余人，攻占了我上五庄区政府之后，各地匪徒闻风而动，纷纷麇集于马英周围。

马英依仗其人多势众，于12月5日拂晓，率匪数千人，包围了桥头、大通等地，并疯狂地向我驻军发动攻击。

当时，驻守桥头的是我军第 3 师骑兵营营部和两个骑兵连；驻守大通的是第 3 师第 9 团（团部和 2 营两个连）。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万分危急。

天刚拂晓，就有一位群众向骑兵营报告：“山那边有两千多土匪，正在准备向你们进攻。”

骑兵营闻报后，立即派人上到南山头了望，发现匪众甚多，远远不止两千人。

营长周泽湘马上派人出去收拢在外执勤人员，但是连一人都没有收回来，他们都在匪乱中牺牲了。这天上午，河东被匪徒攻占了，只有河西高地及几处大院为我军固守着，土匪胁迫着大批群众蜂涌而来，他们则跟在其后。骑兵营一边向师部求援，一边浴血奋战坚守阵地。

5 日下午，军部接到匪情报告后，贺炳炎军长、廖汉生政委迅速主持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先派 3 师师长兴中率领 7 团的 2 个营赶往桥头和大通增援，以解两地之围。

傍晚，军部又命令驻乐家湾的 2 师 6 团 1 营由副团长张祖台率领，炮兵团的 1 个营由该团副团长阎廷明同志率领，从西宁迅速赶往桥头，执行解除桥头之围、巩固桥头据点、保证西宁经桥头到大通、门源交通安全的战斗任务。

桥头镇位于西宁市西北 35 公里，是一个只有 200 余户人家的小镇，有 3 条公路分别通往西宁、门源、大通。桥头的地形险要，东北面有两座大山，犹如两扇紧闭的大门，只有一条公路穿过峡谷，通往门源。北川河由西北流向东南，从镇中穿过，把桥头镇分成东西两半。河上有一座桥，连接南北交通，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倘若该镇失守，我军对大通、门源的军需供应就会被切断，大通、门源即处于孤立无

援的境地。

12月6日凌晨,6团1营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于拂晓前到达距桥头以南1.5公里左右的小村庄新城。为了搞清桥头的情况,副团长张祖台派杜参谋骑马先头侦察。

半小时后,杜参谋回来报告说:土匪已占领桥头东北面的两座山峰和南面的山顶,并有部分匪徒冲进桥头镇,攻占了桥北半个村庄。我3师骑兵营和7团3营被迫退至桥南的村庄内,并有部分伤亡,正与敌人隔河对峙。

张祖台当即把上述情况报告军部,副军长王尚荣命张祖台统一指挥在桥头的部队,坚决打退敌人进攻,巩固桥头据点。

于是,张祖台马上召集两个步兵团和炮兵团的负责干部研究作战计划。根据情况分析,北山的土匪人数众多,而且居高临下,对桥头威胁最大。因此,只有先把北山的敌人歼灭,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解除对桥头的威胁。

6时半左右,我军抵达桥头镇。桥北的土匪尚未发觉我增援部队的到来。由于一夜的长途急行军,部队饥渴疲劳,所以决定先让战士们稍事休息和准备。

在战士们休息的时候,张祖台与各单位领导一起,对兵力作了部署:炮兵营在村南占领阵地,作好射击准备;7团3营加6团1营3连在炮火支援下,自桥南正面向敌发起冲击;骑兵营一部上南山设防,以防敌人从背后向我袭击;6团1营1、2连,在火力掩护下,涉过北川河,插到敌人背后,切断敌人退路。发起攻击时间,定为上午7时。

正当我军部署之时,桥北土匪首先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并有200余名匪徒冲过大桥,占领了桥南临河的部分民

房。于是，张祖台命令部队立即按原计划投入战斗。炮兵首先用迫击炮向敌密集队形轰击，以支援正面部队向敌实施反冲击。同时，6 团的两个连迅速涉过北川河，插至敌人背后，实施南北夹击。

6 团发起进攻后，我军重机枪构成密集火力网封锁了大桥。插到敌后的两个连组织火力堵截，除少数土匪跑脱外，大部土匪被我歼灭。我军收复桥北后，对逃敌实行火力追击，并以 1 个排占领北山。接着又将 6 团 1 营调回桥南，包围了冲过河的 200 余名匪徒，上午 9 点，被我军全部消灭。中午时分，南山上的匪徒也被我军击溃，至此，战斗基本结束。共计毙匪 300 余人，俘匪 500 余人。

6 日下午，张祖台向军部报告战斗情况后，得知大通仍被 2000 余匪徒包围，军首长命张祖台火速派兵增援。张祖台令 7 团 3 营赶赴大通，加强守城力量。7 日上午，6 团两个营在政委冀春光带领下，从西宁赶至桥头。当日下午 6 团两个营及炮兵营继续向大通增援。张祖台奉命仍指挥 1 营和 1 个炮兵连与骑兵营一起固守桥头，以防马匪再次反扑。

这时，张祖台获悉匪首马鸿骥率匪徒百余人，于 11 日黄昏从窑洞庄出发，占领了距桥头 10 公里的煤窑沟。煤窑沟是大通的一处煤矿，西宁市的生产和生活用煤都由这里供给。匪徒企图切断西宁市的燃料供应，从而使西宁陷于混乱。

张祖台经过对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后，决定对煤窑沟进行夜袭。

12 日 11 点左右，由 6 团 1 营营长王健斌率领 1、2 连，从桥头出发，向煤窑沟赶去。虽已是天寒地冻的季节，由于

路赶得急，干部战士一个个湿透了棉衣，头上冒着热汗，凌晨两点，赶到煤窑沟，对敌实行了严密的包围。

天色微明，趁着敌人熟睡之机，我军发起攻击，敌人来不及组织抵抗，即被我军全部消灭。这次袭击，共毙俘敌人 80 余名。当天下午 1 营仍返回桥头。

12 日下午，马英又纠集残余匪徒约 600 人，其中包括一半骑兵，从西北面的大山中向桥头进犯，企图再次攻打这一重镇。

张祖台立即将敌情向军部作了报告。为了全歼这股敌人，军首长命令 6 团将敌吸引到我阵地前，尔后，从大通的 3 师派出 1 个团的兵力，经窑洞庄从背后夹击敌人，并断其退路。同时，军部调 2 师骑兵营连夜从湟中出发向桥头增援，协同 6 团围歼敌人。两路援兵预计 13 日上午 10 时左右到达。

张祖台接到军部指示后，于拂晓前率 6 团 1 营、3 师骑兵营占领南山，准备对敌实施反突击。

13 日清晨，马匪向我南山阵地发起攻击。

我军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构成火力网进行拦阻射击，打退了匪徒多次进攻。上午 10 时，2 师骑兵营到达新城，张祖台即命令骑兵营就地待命，并告诉骑兵营长魏家祯来桥头接受任务。中午，有 200 余匪徒骑兵爬上西南面的山头，企图从侧面袭击我军阵地。而此时另一路援军由于中途受阻尚未到达，如再推迟，势必延误战机。于是张祖台即命 2 师骑兵营从新城上山，抢占南面的山头，向敌人骑兵发起攻击，以配合 6 团 1 营从正面向敌进攻。

马英见我军火力猛烈，其部遭我大量杀伤，贼眼骨碌碌

一转，立即指挥匪众撤退。

为了不失时机地消灭敌人，张祖台命令 6 团 1 营自正面、2 师骑兵营从侧翼对敌实行夹击。进攻一发起，马匪残敌即弃马丢枪，纷纷逃窜，我军乘胜追击，横扫残敌。至下午 2 时许，战斗胜利结束，共歼敌 200 余人。

傍晚，2 师骑兵营田惠普教导员给张祖台打来电话，说有一司号员在追击溃匪时击毙一名矮胖子土匪，从尸体上搜出一枚水晶图章，但不认识上面的字。

张祖台当即叫他将图章送来团部。原来，图章上刻的是“马英之印”四个篆字，但只凭一枚印章尚不能断定就是马英，还须对尸体进行辨认。张祖台当即派团除奸股长王巨才带 1 个侦察班上山把胖子土匪的尸体搬回来。第二天，师部从“军官训练处”派来一名原马军军官，经他辨认证实，矮胖子土匪正是恶贯满盈的匪首马英。

桥头一战，土匪死伤惨重，马英被毙，土匪群龙无首，再也不能大规模地组织力量向我军进犯了。

第六章 保卫大通

西宁刚解放，旋即由 3 师组建了警备司令部。师长兴中、副师长李书茂任正、副司令员，政委曹光琳任政治委员。师首长召集各团干部开会，布置任务，要求大家在各自的防区内清匪肃特，收容散兵游勇，尽快安定社会秩序，并组织工作组，做社会调查，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

11 月 10 日，9 团奉命移防大通。团直和 2 营营部驻县城，2 营 4 连驻下磨庄，1 营驻桥头镇，3 营驻化隆。

大通县城内，回、汉族杂居。由于反动政权的挑拨离间，民族之间隔阂很深。经部队工作组和县人民政府共同作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方使情况逐步好转。特别是我军将 50 多匹退役军马无偿地送给附近贫困群众，派出医生给当地群众看病，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与爱戴。回族群众称赞说：“过去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军队！”但是，不久一些人送来消息说，马步芳的军官马老五（即马忠义）和骑 8 旅旅长马英不甘心失败，正在纠集残兵败将，煽动、胁迫群众准备掀起反革命武装暴乱。

12 月 5 日拂晓，一阵激烈的枪声把团政委余金龙吵醒，参谋孙立明报告说：“4 连电话不通，联系中断！”这时，城外的枪声、喊声已响成一片。

余金龙和参谋长王辉、参谋孙立明立即上城观察敌情，发现城外到处插着敌人的旗子，叛匪和被裹胁的群众混在一起约几千人，呼喊着重“打下大通城，夺取西宁市”。我军被敌人包围了。4连驻地磨庄也传来激烈的枪声，说明叛匪分股开始向我驻军发起围攻，情况十分紧急。

9团从驻防大通后，抽调许多指战员组成工作组下乡开展群众工作，城内只有2营的两个连、团机炮连和1个干部轮训队，而且人员不全。

余金龙正考虑如何组织力量反击敌人时，大通县县长马有成赶来了，大家一起商定了对策：通告群众，这是土匪闹事，不要惊慌，不要外出，以免流弹伤人；加固城防、严密监视敌人；部署兵力，坚守全城；对敌人实行突击；王参谋长带一位参谋留守，余金龙带1个机炮排和干训队突围接应4连。

早晨6点，余金龙组织部队从北门外到西门外向敌人突击了一下，觉得敌人火力并不怎么强，于是便抓紧时机向4连驻地突进。路上发现有两三千敌人正向桥头镇移动。但当时余金龙带的部队太少，既没有把握歼灭他们，也没有力量去增援桥头，只好先把4连接回来再说。

大通县城到下磨庄有5公里多路，沿途都有敌人。余金龙他们边打边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终于接近4连驻地，4连被敌人三百多骑兵和四五百步兵紧紧包围，在肖万寿连长指挥下，已经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机炮排冲进庄后，4连的斗志更加旺盛，但敌人又包围上来，并发起三次猛扑，我军打退敌人时天已傍晚。

吃过晚饭，余金龙命令3挺机枪开路，部队随后攻击突

围，当冲出村庄后发现有一个班没突出来，又立即进去接应。等杀回县城西关时，已是次日凌晨一点。除 2 人牺牲、3 人受伤外，全部胜利返回大通县城。

再说城内这一天，情况也十分紧张，敌人多次攻城均被打退。干部战士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奋勇对敌。不少战士说：我们一定要守住县城；万一县城守不住，就守团部；团部守不住，就和敌人同归于尽，绝对不让敌人占半点便宜。

余金龙回到城内不久，城外枪声就响开了，几个领导同志立即上城观看，估计是驻桥头镇的 1 营和敌人打开了，遂决定由余金龙带两个连出去接应。果如所料，出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后，走了几里路，就和突出的 1 营会合。1 营在桥头镇苦战了一天一夜，死伤 100 多人。1 营突出桥头镇后，敌人便集中六七千人猛攻大通县城。9 团用从太原战役时缴获的老虎炮向城外东、南、西 3 处的敌群各打了几炮，老虎炮果然名不虚传，一个炮弹就有 50 多公斤，炮弹在敌群中炸开，直炸得敌人血肉横飞。

次日中午过后，突然大通城外枪声大作，余金龙估计援军到了，便带队出城接应。部队会师，县城之围随之解除。当晚，我军 1 个营留守外，其余全部出动袭击敌人，此后经过 5 天 4 夜的连续奋战，我军前后俘敌近 2000 名，大通匪乱平息。

第七章 湟中平叛

匪首马英在大通、桥头发动叛乱后，匪首韩效侠、马折麻禄在湟中县的小峡、鲁沙尔也发动了叛乱。他们互相呼应，妄图东占小峡，扼兰、青公路咽喉，断我与内地交通联系；南占湟中，北据大通，西据上五庄、水峡等地。得手后，分进合击西宁，消灭我军，实现其反革命复辟。

在小峡地区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匪首，是已经向我军投降的国民党 82 军 248 师 1 团团长韩有福，又叫韩效侠，韩有福系湟中小峡人，还纠集原马步芳部队军官孙毅、马海龙、甘次代、依四马等进行煽动叛乱。在叛乱前，韩有福窜到湟中平安造谣惑众，诬蔑“解放军是汉人的军队”，“要杀回灭教”，说什么“解放军是河里的水长不了”等。

1949 年 11 月 12 日，韩有福窜回小峡家里，玩弄假投降的把戏，借交枪之机，杀害了我 2 区区长王健和小峡乡长张生祥。

阴谋得逞后，韩效侠又写信给西沟村村长说：“限 45 岁以下，17 岁以上的男子，于 12 月 8 日天亮时到乐家湾山上，不得泄露消息，所需马匹、武器自己准备。”

12 月 8 日拂晓，天刚蒙蒙亮，韩有福纠集匪徒 400 余名，趁着人们熟睡之机，公开叛乱，占领了小峡，切断了甘

青公路。驱赶 30 里铺附近村庄的群众到 30 里铺，叫嚣各村 45 岁以下男子自带马匹武器来，进犯乐家湾。扬言：谁家不去，要杀死老幼，烧掉房子。

当时，小峡陶瓷厂工人李含寿不从，即被捆绑住手脚，摔入小峡桥下水中。落水前，韩有福还猛击一枪，致李含寿惨死。农民苗铁也被捆绑后丢入湟水河中，被水冲到沙滩上侥幸活命。一些群众担心被害，只得跟随匪徒叛乱。

韩匪叛乱后，1 军首长立即调动驻鲁沙尔的 2 师 5 团主力，前往围剿。5 团于 9 日拂晓向占领小峡的叛匪发起攻击，击毙叛匪 37 名，俘获甘次代、依四马匪首以下 64 名，其余残匪向小峡东北方向逃窜。我军乘胜追剿，在红庄、曹家堡附近又俘叛匪 70 余人。

小峡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被迅速平息，匪首韩有福在我军追捕下，于 1949 年腊月被我军击毙。

匪首马折麻禄是湟中县的又一大土匪头子。他在共和县跟随马元海（国民党青海参议长）投降我军后，又逃至湟中县大石门一带为匪，积极纠集马步芳部队的残余、散兵游勇、惯匪等，扩展势力，进行破坏活动。同时与马步芳骑 8 旅旅长马英相互勾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窜到大元乡、康城川一带村庄抢劫。为免遭我军打击，他们昼归夜出，分成小股活动，扰得群众终日惶惶不安。还勾结上措隆马有青、水沟马福英、鲁沙尔喇成德等人，散发反动传单，造谣惑众，利用清真寺进行反动宣传，散布“马继援已占领兰州”，“马英带领十万人正攻打西宁”，“解放军很快就完了”等等，煽动群众为“保教保家”起来打倒共产党，叫喊：“见了解放军下枪，见了积极分子杀光”，并威胁群众谁要不

参加就把房子烧掉，气焰非常嚣张。

马折麻禄股匪汇集了马步芳部队残余，并裹胁康城川一带部分群众，共 1000 余人，编两个团，1 个独立营，任命马有青为 1 团团长，马福英为 2 团团长，喇成德为独立营营长，马折麻禄自封为旅长，马彦为匪指挥官，马维德为匪参谋长，原鲁沙尔伪镇长马禄为内应，刺探我军政情况。决定于 1949 年 12 月 9 日，即农历 10 月 20 日晚以鸡叫头遍为号，从东、西、南三面包围鲁沙尔，企图一举消灭鲁沙尔我留守部队和县政府工作人员。当日晚 11 时左右，叛匪为防止我军及县政府工作人员与外边联络，割断了电话线，并在蚂蚁沟挖断公路，砍倒树木，设置路障，以防我军增援部队迅速到来。

湟中县委和驻军在得知叛匪活动企图后，立即进行了部署，作好战斗准备。

这时，2 师 5 团只留有 1 个营的兵力驻守鲁沙尔，其余已调到小峡平叛，根据这一情况，以部分兵力占领县政府对面山坡有利地形，其余兵力部署在县政府后面西山拉才林一线。

当夜 11 时左右，叛匪一部进入塔尔寺隐蔽，夜 12 时左右信号枪三响，叛匪开始向鲁沙尔街和我军阵地攻击。

叛匪首先攻击我 4 区区公所。在战斗中我 5 名工作人员中弹牺牲。

叛匪由于久攻不下，不断遭到伤亡，最后放火焚烧了区公所、贸易公司和当铺院。只见火光熊熊，燃红了半个天边。随后，匪首马折麻禄、马彦带领 300 余骑从塔尔寺冲下来，10 日清晨向我县政府和驻军阵地猛攻。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一股叛匪进入鲁沙尔小学，另一股叛匪沿河沟直下，强攻我军重机枪阵地，冲锋 8 次均被我军击退，匪徒死伤一片。

我军鉴于敌众我寡，决定撤出县城。叛匪进入公安局，县政府被包围，县政府的前后门都被叛匪堵死。这时，县委副书记余安荣立即决定，坚守还击，待机突围。于是用羊毛捆子堵住了大门，用仅有的二支步枪一挺机枪封锁了县政府门前大路，同时派 4 个人到屋顶四角，监视叛匪行动，用手榴弹杀伤敌人。当时包括武工队、省记者和县机关同志只有 20 余人。

晚 9 时以后，叛匪呼喊口号，蜂拥向县政府大门冲来，同时用土炮轰击，其响声和震动程度与炸弹爆炸无异，的确有些吓人。当地干部说，这是当地火铳，其声虽可怕，但没有大的破坏力，像我们这样的围墙是攻不破的。在我步枪、机枪还击后，特别是机枪手马兵、武尚志同志在叛匪接近有效射程时，突然扫射，把叛匪打的乱作一团，退了回去。叛匪向我县政府大门先后冲击了 4 次，均被我击退。

12 日清晨 4 点多钟，县机关的同志终于把突围洞口挖通了，全体同志从洞口撤出后，按规定顺序前进，安全转移到谢家寨一带山腰，向西宁方向前进，天明时到达水磨沟。在县机关人员突围撤离两小时后，于 12 日早上 7 点左右叛匪才胆颤心惊地进入县政府院内。

这时，匪徒马折麻禄及叛匪自以为阴谋得逞，其匪徒本性立即暴露，公开抢劫群众财物，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伪镇长马禄也从地下钻出来，剥下伪装，马折麻禄任命他为“县长”。

再说我 1 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副军长兼 2 师师长王尚荣在得悉马折麻禄叛匪攻打湟中鲁沙尔后，即令 2 师 5 团主力从小峡火速回师湟中，平息鲁沙尔叛乱，并调驻防湟源哈拉库图的 2 师骑兵营，星夜兼程急驰 90 公里，从白土庄一带配合 2 师 5 团主力全歼鲁沙尔叛匪。5 团傍晚到湟中附近徐家寨。经研究决定，5 团 1 营为左翼，沿蚂蚁沟东边山梁向鲁沙尔之敌攻击前进。

1949 年 11 月底，2 师骑兵营奉命到兴海县去接收伪县政府。12 月 6 日突然收到上级电报，令骑兵营火速返回西宁。营长魏家桢和教导员田惠普估计，可能有紧急战斗任务。根据当时骑兵营分驻两地的情况，决定由田惠普带身边的 100 多骑兵和一部电台立即出发；营的大部兵力由营长率领随后跟进。

田惠普带两个排的骑兵先行，马不卸鞍，经过 5 天的急行军，到达湟源以南 30 公里的哈拉库图村宿营。12 月 11 日晨，收到师部电报，令骑兵营配合 5 团收复湟中县城。

田惠普带部队快马加鞭立即赶到湟源 4 团团部，打电话向师报告，并请示战斗任务。

师参谋长王时军命令：明日拂晓配合 5 团攻城，骑兵营由西向东攻，负责城西横宽 5 公里的地段，发现敌人突围时负责堵击，如果敌人已经突围，骑兵营负责追击，力求全歼。

当晚，骑兵营在离湟中城北 10 多公里的一个村庄吃饭时，田惠普在访问群众时得知：湟中城西是一条川，有一个白土庄，匪徒大多数在城内。这个情况给田惠普定下决心提供了依据。田惠普和连的干部商定，乘夜隐蔽行进，埋伏城

西 2.5 公里处的白土庄。具体部署等到达目的地后再定。

这时，弯月高悬，光照大地，大地一片银装素裹。骑兵健儿在马蹄声的伴奏下前进。突然远方传来零星枪声，田惠普立即告诉大家对敌单枪射击不予理睬，以免打草惊蛇，贻误歼敌大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夜行军，顺利到达预定地点白土庄。

在朦胧的月光下，田惠普和连队干部又反复观察了地形，研究作战方案，最后决定：5 连沿川南的小山梁向湟中城攻击；4 连隐蔽在川北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堵截和追击的战斗。电台和后勤人员设在村内，指挥所设在村南小庙。

12 月 12 日拂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空中突然升起 3 颗红色信号弹，总攻开始了！5 团进攻的枪声响彻山谷。同时，骑兵营 5 连也向敌人展开进攻，我军从东、南、西三面向匪徒压去。

这时，徒步的匪徒争先恐后夺路向西逃窜，当他们进川 300 米时，田惠普命令 4 连 1 排乘马向敌人冲锋。只见骑兵战士一面高喊杀声，一面勇猛冲入敌群。他们纵马挥刀猛冲猛砍，寒光闪闪的马刀，忽上忽下大显威风。有的匪徒被马刀砍断臂膀，有的匪徒被战马撞倒踏伤，有一匪徒卧倒在地，举枪射击时，被我骑兵战士俯身一刀，劈开了脑袋瓜儿。匪徒们丧魂落魄，抱头四处逃命，被我 4 连团团围住。战士们高喊：“缴枪不杀！”200 多匪徒乖乖地当了俘虏。

骑兵营在湟中进行了 5 次战斗，只有 4 连 1 排副排长负轻伤。湟中战斗，骑兵营杀出了军威，4 连 1 排创造了以 1 胜 10 的战绩。

当战士们押送俘虏进城时，看到在一个院内被匪徒杀害的 5 具老百姓尸体，惨不忍睹。假如解放军不及时收复湟中县城，还不知有多少无辜群众被杀害！

叛匪除马折麻禄等少数匪徒漏网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只当了几小时“县长”的马禄惧我军威，又潜伏下来，继续与人民为敌，于 1951 年镇反运动中被我处决。叛匪指挥官马彦于 1953 年被我处决。匪首马折麻禄逃跑后又窜到大石门一带继续为匪，于 1950 年 11 月被我剿匪部队击毙于大通县境黑林卧马。

鲁沙尔平息叛乱的战斗，击毙叛匪 100 多人，俘敌 800 余人。

为巩固这一胜利，12 月 31 日至 1950 年 1 月 9 日，以 5 团政治委员文山为团长的湟中工作团到大小康城川一带对散匪进行政治争取工作。10 天时间中争取散匪 540 名，收缴步枪 34 支，短枪 2 支，子弹 139 发，马 6 匹，衣物多件。

第八章 从大通打到柴达木

1949 年 12 月，为了彻底、快速地剿灭流窜在青海各地的股匪，1 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决定组建骑兵团，并由钱治安任团长兼政委，周龙任副团长，孙巩任参谋长，戴春山任政治处主任。首长们在谈话中指示说，3 个师各组建 1 个骑兵团，团直由军直属机关组成。司、政、后人员挑选后报军部任命，时间不能超过 5 天。

钱治安感到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怕完不成任务。贺炳炎批评钱治安带头讨价还价，然后斩钉截铁地说：“任务不但要完成，而且要完成好，完成不好，首先打你的屁股。”

12 月 19 日，骑兵团如期组建起来了。1950 年元月 17 日，进驻湟中县的上五庄。这里是个回族聚居区，背依大山，直通草地，进可攻，退可守，有广大的回旋余地。

军首长命令骑兵团要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不能进清真寺，不准枪杀俘虏，要多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争取站稳脚根，然后才谈得上完成剿匪任务。

全团 2127 人，军马 3200 多匹，团辖 3 个营，每营 4 个连。骑兵团的突出特点是团大、人多、资格老，是一支对敌人有很大威胁的战斗队伍。团的领导干部多是老红军或抗日初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三九式”，个别连干部还是经

过长征的。

骑兵团进驻上五庄后，匪徒们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搞垮骑兵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把 1 军烂在青海，把骑兵团烂在上五庄。因此，当部队一到上五庄，接踵而来的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又一个陷阱。

骑兵团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有耳听不到营外事，有眼认不出好坏人。一些上层人物有时给透点风、送点情报，也是与土匪事先商量好的。骑兵团按照他们提供的“线索”去清剿，次次扑空，把部队拖得很疲劳，引起部队上下之间互相埋怨。

当敌人这一伎俩逐渐被骑兵团识破后，他们又变换手法，采取打进来的手段妄图从内部瓦解我骑兵团。

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教导总队少将教官谢颠生，解放后在解放军官训练处学习一个时期被分配到骑兵团。他表面上假装积极，骨子里却极为反动，经常窃取我军情报送给敌人，还和叛匪所组成的“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秘书长、伪 82 军副官马德山联系密切。

青马连长马成功，经过军区参议室一个参议的介绍打进骑兵团当参谋。他在骑兵团经常寻机与土匪联系并根据敌人旨意，给骑兵团送假情报，引诱骑兵团上钩。一次，敌人要到乌拉脑滩接运粮食。他却说土匪要袭击多巴，用调虎离山之计把骑兵团引开，给匪徒提供方便。

青马 248 师中校副团长蒋发德，经过解放军官训练处学习后，来骑兵团任教官。然而仍与马德山保持密切联系，并伺机去兰州与匪首冶虎成串联，阴谋到西藏去策划暴乱。

在积极打进我军内部的同时，敌人还施美人计，企图瓦

解我军斗志。

一天，骑兵团 1 连连长晚上巡营时，被一个受匪徒指使的女人拉住不放，当即遭到严词痛斥。2 连 1 个班长去扎纳庄执行任务，途中被一女人截住关进房子里逼着与他睡觉，班长乘机从窗户逃出。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其中也有别人意志衰退，被敌人糖衣炮弹所打中，拉下水的。斗争复杂而尖锐，团领导及时利用这些活生生的斗争事实，对指战员进行反腐败教育，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在上五庄站稳了脚跟。

1950 年 8 月中旬，马德山率股匪四五百人，由门源窜到大通。沿路命其匪徒见我骑兵就开枪，见了积极分子就杀光。其所属通讯大队于 8 月 12 日在大通北区残杀我地方干部邓有才等 4 同志后，又窜往互助县残害人民。

骑兵团在佑宁寺接到军部情况通报，随即又接到行动命令，部队迅速出发赶至互助县时，天色已黑。为了不暴露目标，骑兵团避城绕道进至大磨儿沟口，在那里正好碰见一位向县委报告敌情的农会干部，因他熟悉情况，骑兵团就请他带路返转到小磨儿沟。进沟不远，就与叛匪相遇。指战员们跃马挥刀，冲入匪群，左劈右杀，勇不可挡。敌人死伤惨重，丢下帐篷等物，仓皇逃窜。战士们紧紧咬住匪徒穷追猛打，最后将敌人压在一个山沟里，歼其大部。

正当马德山走投无路，束手待毙时，忽然天降大雨，部队行动不便，使眼看被活捉的马德山又乘机带着 13 个匪徒夺路逃走。

这次战斗，共击毙匪徒 114 人。俘匪首反共救国军总部直属保安骑兵团总队长马文英、马祯和匪徒 300 余人，缴获机

枪 2 挺，长短枪 62 支，骡马 136 匹。

互助县七区瓦窑村的鲁国佐及鲁顺德是又一股凶恶的土匪。鲁国佐曾任马步芳的卫士大队长，鲁顺德是个罪恶累累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解放后，叔侄二人先后纠集匪众发动暴乱，并担任了“反共救国军”湟北纵队的骑兵团长，他们常活动于互助、大通、门源及甘、青交界的永登等地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950 年 6 月间，鲁顺德一次就在互助八区松多乡打死我战士 15 名；鲁国佐先后与我军及公安部队交锋 20 多次。

为了消灭这股敌人，骑兵团副团长周龙奉命率领 1 营，进驻互助，负责清剿。部队抵达互助不久就探明了匪情：鲁顺德股匪 80 余人，在互助的无浦沟一带，正在横行作恶。军政领导研究决定，由互助县县长吴正夫带领地方少数武装，配合 1 营消灭该匪。

大家经过一夜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前抵达互助东北的无浦沟。当匪徒惊醒时，已成瓮中之鳖，束手被擒。只有狡猾的鲁顺德乘机窜出房屋，骑上一匹光背马夺路而逃。

8 月 29 日清晨，流窜在外饥饿疲惫的鲁顺德带着一副狼狈相，刚刚窜回家里想喘口气，他的儿子和妹夫就报告了我征粮工作队。工作队的同志立即组织民兵包围其家，被我民兵当场击毙。

鲁国佐要比其叔狡诈刁顽得多，虽经我连续追剿打击，仍四处流窜，为非作歹。1950 年 2 月 7 日，我互助八区巴扎、嘉定、甘禅等乡民兵将其包围于奇拉沟击毙。

1951 年 1 月 28 日，军政委廖汉生来上五庄兴致勃勃地检阅骑兵团，并命令骑兵团到柴达木配合兄弟部队，剿灭从

新疆窜入祁连山等地区的胡赛因、乌斯满等股匪。

胡、乌匪徒十分狡猾。2月2日骑兵团抵达都兰时，匪首胡赛因即派了十几个人，伪装成商人，刺探我军情报。这些商人被我地方武装抓获后，由于省委统战部负责人不知真相，被其花言巧语蒙骗，放走5人。钱治安得知后，派了1个排绕道追击，但是已晚了，他们向胡赛因报告了我进军征剿的情况后，胡赛因立即率匪遁逃。

还有一次，骑兵团从昆仑山麓返回营地时，碰上胡赛因的儿子和家属共7人，他们谎称是来投降的。骑兵团轻信了他们的谎言，以礼相待，并派一位副指导员和哈萨克族向导扎肯陪同他们随队回营，结果半路上副指导员被他们杀害，向导扎肯也和敌人一起逃跑了。沉痛的教训，使骑兵团增长了智慧，总结了经验。后来，在追剿残匪中，处处谨慎，打了几个胜仗。

柴达木荒僻辽阔，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在这里剿匪如同大海捞针。不仅要与敌人斗智斗勇，而且要战胜大自然带来的种种困难。在昆仑山麓，由于高寒缺氧，战马只是喘气吐白沫，不要说骑，就是牵着都走不动。过盐湖时，马蹄子全烂了。同志们舍不得骑，便拉着走。在戈壁荒野上找不到柴草烧开水，大家就用冷水拌炒面充饥，没有锅灶，就在青石板上烙饼吃。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后来，他们配合2、3、4军骑兵团和新疆的一个骆驼大队，于2月29日在柴达木与甘肃交界处生俘匪首乌斯满，取得了柴达木地区剿匪的胜利。

第九章 痛歼“反共救国军”

马老五原名马忠义，是一个恶贯满盈，誓与人民为敌的马步芳军官。1949 年，当我军解放青海时，马老五秉承马步芳的旨意，于 1949 年 10 月纠集匪众千余人，参与马家军残敌在甘肃临夏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在遭我沉重打击后，马老五率残匪由临夏西川、毛泥沟、尹家集地区，窜入青海化隆境内，分散隐蔽，四处流窜。并组织新编第 82 军，马老五任军长，以卡里岗为根据地，抗拒我政府工作人员接管。我军立即派武工队挥戈进行围剿。

不久，马老五迫于我军事打击，又东窜民和县。

我军获悉后，立即以 1 个营附迫击炮连，连续昼夜追剿于化隆、民和之间地区。1950 年 3 月 10 日，当该匪西窜化隆青布集时被我歼灭一部，11 日残部又被我包围于庄子湾马营山，因遭我 9 个昼夜的追歼伏击，敌人已疲惫不堪，走投无路，经我派人争取，马老五于 3 月 17 日向我军投降，被送入西宁解放军官训练处。

但马老五死不悔改，于 4 月下旬由该处潜逃于贵德东南之藏民地区，与马全彪、尕布官人等组织“反共救国军”，企图再次煽动暴乱。

1951 年 1 月 15 日，马老五向不楞地区转移。这一天，他带随员窜入化隆西北后沟村一佃户家，威逼恫吓农民，妄图弄到粮款，继续北逃。

机智的佃户先是热情地款待匪徒，稳住敌人，尔后，以为其筹款为名脱身，直奔县政府报告。县长宋林听了报告，即与 2 团夏伟政委研究情况，便命令郑金映带团部仅有的通讯、侦察各 1 个班，组成 1 个小分队急进后西沟村擒拿马老五。

当郑金映接近该村时，已至黄昏，他们先以 1 个战斗小组占领村北制高点，留通讯员郭彦看守全部马匹，其余人员编成两个组分头接近该佃户的家。小分队逼近窗下，迅速掀开窗户，但不见马老五，这时佃户说可能藏在夹墙内。经数次喊话无效，大家正准备往夹墙内塞手榴弹时，发现马老五从烟筒旁溜出逃走。

小分队立即跟踪追击，此时，夜幕已降，暗淡的月光下，马老五正拼命地朝山沟里逃跑。当他昏头昏脑地经过我控马员附近时，被机智警惕的郭彦发现，小郭立即端起枪，借着月光，瞄准马老五的身影就是一枪，又朝马老五投出一枚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马老五当即倒下，当郑金映他们赶到现场时，马老五已经断气。

郑金映检验了一下尸体，发现一枪击中腿部，手榴弹片击中了马的头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将马老五陈尸三日于西宁大教场示众。这个作恶多端的匪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十章 “顶住了马步芳， 顶不住共产党”

昂拉地区的叛乱，是青海解放初期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叛乱。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项谦拒不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与青马残余土匪勾结在一起，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给昂拉及其周围地区人民造成了新的灾难。

昂拉地区在青海解放前属该地千户管辖，千户为封建世袭官职，直属省政府辖制。位于青海省府西宁市东南 150 公里。据统计，1950 年，青海共有千户 26 人，总千户 1 人，副总千户 6 人。项谦于 1933 年继承千户职位，千户府设在尖巴昂。昂拉有 8 个庄子，故又称昂拉 8 庄。每个庄子有 1 个百户，1 个百户又管几个自然村。在马步芳集团统治青海的黑暗年代，曾多次派兵进犯昂拉，项谦都率部奋起抵抗。凭借依山靠水，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阻止了马步芳的进攻。青海解放前夕，项谦与马步芳的反动军官如马忠义（即马老五）、马全彪、谭腾蛟、惯匪头子宗吾加洛等结为至交，并且在昂拉强化了千百户制度，使昂拉形成了封建割据。

1949 年 9 月，当解放军至甘肃河州和青海化隆时，项谦曾派人带着礼品向解放军致敬。9 月 15 日，贵德县解放

后，昂拉划归贵德县 6 区，党和政府承认项谦的千户职位，仍让项谦管理昂拉地区。

1949 年 12 月至次年发生的反革命叛乱，对项谦影响很大。叛乱被平息之后，许多漏网分子聚集昂拉，对项谦极尽拉拢收买之能事。如匪首韩进禄，乔装牧民穿着皮袄到昂拉，借口贺项谦建新房之喜，送了一匹马、一支枪、一个元宝和 250 块白洋。匪首谭呈祥去时，送了一支三八枪。匪首马成贤去时，穿着袈裟，冒充夏琼寺的切智海，送了两条毛毯、一个金钗、一支三八枪、一件褐衫及青马黑马各一匹。循化惯匪头子宗吾加洛带着他的儿子和 3 个土匪潜至昂拉侯加村。匪首马木沙到昂拉后，为项谦外出卖鸦片，购买子弹。青马前军官马金彪逃到昂拉，给项谦送了步枪三支、机枪两挺。这些马步芳残余军官和惯匪头子钻到那里以后，便充当反革命急先锋，带领叛乱分子向已被我解放的地区进攻。

党和政府对项谦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和教育，1950 年 8 月 6 日，经反复做工作，项谦来西宁参加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马朴的吊唁活动，并向省党政军诸首长报告了他受匪特蛊惑，迟迟未来致敬的原委。项谦在西宁期间，省政府召开座谈会表示欢迎，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在讲话中指出：“今天的反动分子还没有彻底肃清，他们看到我们翻身了，就要破坏，尤其是蒙藏同胞性情忠厚，住的地方分散，匪特更容易钻空子，不要受了他们的欺骗。”

项谦在发言中说：“解放后我对政府的政策不了解，曾派人到甘州和解放军接过头，以后解放军和土匪发生了战争，又听了坏分子的谣言，而对政府发生误会。今天来到政

府，蒙各位首长热情地招待，认识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重视是真正以兄弟民族看待，今后我一定要坚决靠近政府。”但项谦从西宁回去以后，在叛乱分子的蛊惑煽动下，又背信食言，进行了武装叛乱。

1951 年底，昂拉千户项谦在反动军官马全彪等人的煽动下，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暴乱。

昂拉地区位于贵德东南，距县城 120 公里，东北面紧靠黄河，与化隆县隔河相望；南及东南与同仁、循化相接；西靠大雪山及尖扎草地。区内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山间仅有小道可行，山沟两侧多为密林、石崖陡壁，通行极为困难。该区有 36 个农户村庄，4 个帐房村庄，1100 余户，内居 5500 多人，绝大多数是藏族，以农为主，仍以千户名义维持社会秩序。昂拉千户为封建世袭称呼，项谦在父死后继承千户，为第 12 代封建世袭头人。该地区依山傍水，地势偏僻险要，与内地自然隔离，是造成其封建割据的有利条件；又加上多年反动统治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之较容易煽动群众与我对抗。

1949 年 12 月，青马残匪在大通、桥头叛乱之时，项谦即与马成贤、谭呈祥、韩进禄、谭腾蛟等密谋暴乱计划，组成“西北反共救国军”，亲任反共救国军第 2 军军长，并参加“西北反共革命委员会”，积极配合暴乱，暗杀我军人员，袭击我贵德铁瓦寺、化隆阿藏吾具驻军。大通、化隆、循化暴乱被我平息后，一些漏网匪首即逃往该地区隐蔽起来。项谦与这些军官和逃亡恶霸地主相互勾结，对外实行封锁，对抗人民政府。

我党对项谦曾进行政治争取，与之谈判 17 次之多，并

订立 12 条协定，耐心等待其投归。但项谦毫无诚意，相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与我为敌。他积极网罗匪徒 2100 余人，搜集长短枪 2176 余支，轻重机枪 13 挺，八二迫击炮 2 门，并乘机进行了暴乱，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为了尽快解放青海全境，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1 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决定，由步兵第 1 师、第 2 师部分部队与骑兵团、骑兵支队，第 4 军骑兵团，骑兵第 6 团，青海军区独立第 1 团，贵德独立营等万余人，组成剿匪大军，统归第 1 师领导指挥，采取东、西、南、北四面合击和层层包围战术，歼灭项匪。

第 1 师于 1952 年 4 月下旬召开了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明确了各部队的任务。要求 4 月 30 日之前各部队均到达指定地区，隐蔽集结，并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5 月 1 日，乘黑夜秘密渡过黄河，2 日拂晓各向指定目标攻击前进。

北路部队 1 师 1 团肩负主攻任务，5 月 1 日夜，在下多巴乘夜暗秘密渡过黄河后，经麦里雄马、李家，于 2 日 5 时攻占节里岗。罗哇、麦里、公民等地之匪闻讯，如惊弓之鸟，相继向西南逃窜。该团以一部堵击苦沙堂之匪，一部尾追逃匪主力，向德钱寺攻击。部队占领界石堂后，第 3 营又奉命向错尔山攻击，匪向西窜逃。团主力遂进至下扎、扬江地区搜剿残匪。

第 6 团、独立团、第 3 营，继第 1 团之后，在下多巴渡过黄河，于 2 日 5 时由多浪、加浪向摇七、勒见等地攻击。6 时半，在炮火支援下，打退摇七股匪的反扑后攻占摇七。

独立团、第 3 营 6 时半攻占楼可、勒见。9 时半全部兵力向米慕山攻击，匪大部向扬江溃逃。

第 2 团于 5 月 1 日 24 时至 2 日 5 时前，以羊皮筏子在阿藏五具以西秘密渡过黄河。为争取时间与友邻协同动作，第 3 营沿黄河西岸北进向尖巴昂攻击，第 2 营经如及直插尖巴昂。7 时我占领愁家尔冬、日扎后，遭来自尖巴昂及左家地区匪之疯狂反扑。此时第 2 营快速逼近尖巴昂，3 营也乘机发起攻击，并以炮火拦阻逃匪。尖巴昂之匪在我两面攻击下遭伤亡，向北逃窜，我 2 团乘胜追击到牙那冬左家地区，继续清剿残散匪徒。

西路部队于 4 月 30 日隐蔽集结于贵德东南之铁瓦寺以北地区。该路的 1 军骑兵支队于 5 月 1 日 24 时进占尖扎滩，分两路直插尖扎寺，在白土合牙壑与匪稍有接触。2 日 5 时到达麦可沟、羊圈击溃匪 20 余人，10 时占领古石当、才让、羊圈，匪向才让沟逃窜，部队即在古石当、才让沟进行清剿，堵击企图向西逃窜之匪。

第 1 军骑兵团因长毛峡道路崎岖难行，又因风雪交加，5 月 2 日 9 时进至沙漠卡里岗，留一部分担任警戒，主力 18 时进至羊圈布置堵击，因部队极度疲劳，3 日零时残匪 200 余人乘隙西逃。我军发现后，与匪激战 1 小时，歼匪一部，其大部乘黑夜西逃，在追击又歼匪一部。第 4 军骑兵团分两路于 2 日 6 时进至野狼山及德钱寺、尖扎卡以西。第 5 团部队于 2 日 8 时进至背斗山附近地区。独立营于 1 日 24 时进至神楫山、弟君根山一带布置堵击，在堵击中歼匪一部。

南部部队的骑兵第 6 团，于 5 月 2 日 4 时由同仁以东进至拉当山和沙漠卡里岗布置堵击。羊职帐房的土匪经我派代

表劝降后，全部缴械投降。

东路部队由第 3 团和独立团两个连，于 5 月 1 日抢占古隆同仁河桥，2 日 6 时攻占古隆米峪后继续向胡凹攻击前进。匪百余人企图顽抗，在我炮击下，狼狈溃散。第 3 营跟踪追击，并占领羊圈西北高地。整个战斗进展顺利，匪大部溃散隐匿于我包围圈内。各部队即按划分区域转入清剿。

部队进驻各村后，既严惩匪徒，又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特别是我进驻项谦家后，对项谦家中财产进行了保护。项谦胞妹患肥胖病未能逃走，我军予以妥善看护，使其安然无恙，在群众中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许多群众配合我广大指战员夜以继日地遍山搜剿残匪。

战斗进展很快，至 5 月 12 日，除少数匪首漏网外，计毙伤匪 264 人，俘匪 467 人，争取投降 864 人，缴获各种枪 1030 支，各种枪弹 2.9 万余发。至此，昂拉地区之匪患已被平息。

赴昂拉工作的医疗队、贸易队、救济队做了大量工作。医疗队共治疗 3000 多人（次），为病人注射了盘尼西林与六〇六等许多珍贵药品，治好了许多病人。无论打针服药都不收费，贸易队送货上门，商品价廉物美，群众反映很好。

工作组根据各村庄安置分会及安置小组的报告，并经干部了解与考察后，决定对生活最贫苦的群众每人救济粮食 30 斤，次贫者 20 斤。总计对昂拉八庄和罗哇买日、多让俄家、河日哇喜、佳让等庄，救济贫苦群众 395 户，1624 人，第一次发放粮食 3.7 万斤。此后又救济死亡人员家属春粮 1 万斤，贫苦群众粮 2 万斤。同时，因当年天灾虫害造成的

群众生活困难，发放救济粮 3000 斤。

昂拉地区群众的生活困难得到了解决，人心安定，生产也得到了恢复，他们对党和政府由不了解到了解，纷纷称赞党的政策好。赛池活佛说：“解放军对寺院不但没有侵害，而且尽心保护，纪律真是太好了。”德欠寺的几个僧人说：“今天我们看见了自由幸福的太阳，人民政府的恩情实在大。”德庆奴哇村的几个老人说：“从前昂拉内外不通的时候，连一尺布都买不到，今天政府把货物运到我们的家门上来，物美价廉，真是太好了！”昂课村的藏族群众把毛主席像很恭敬地顶在头上说：“这是我们的救星。”其中有几个老年妇女说：“坏人造谣说，共产党来了就要把老百姓杀个干净，原来这些都是假的。”

紧靠昂拉地区、深受项谦叛乱骚扰之苦的尖扎滩全体牧民于 1952 年 5 月 18 日写信给毛主席，感谢解放军平息昂拉叛乱，信中说：

“在马步芳的统治下，我们祖祖辈辈过着痛苦的生活；自从青海解放后，太阳才照到了我们身上。但自从去年 8 月马步芳的残余匪特，组织土匪，反抗人民政府，又将我尖扎牧民置于水火。匪徒压迫我们，不让我们与人民政府往来，羊毛卖不出去，不但买不到青稞，而且从去年 8 月到现在，就没吃上青盐，衣服、靴子更穿不上，生活苦难重重。我们没有靴子穿，还被匪徒强迫着在雪地里放哨。牧民吉合多把脚冻残，类似灾难诉说不完。”

土匪头子古哇秋吉在平叛中被俘以后，人民政府给他治了伤，并在 1952 年 5 月 16 日庆贺剿匪胜利大会上，与 70 多名俘虏一起当场被释放。古哇秋吉感动地说：“我率领土

匪，为害人民，罪恶很大。人民政府不但免了我的死罪，还免费治了我的伤口，回去以后，我一定好好生产，报答政府。”

项谦的兄弟俄日、办事员喀日洛、女婿完得扎喜等缴枪投降以后，都被宽大。人民政府对项谦的儿子和妻子等特别予以保护，把他们埋藏在地下的财物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们。

项谦在我军平叛时逃走，能否争取他回到昂拉，对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平叛斗争的成果，关系极大。西北局和青海省委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西北局认为，争取项谦归来，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能切实地体现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洛工作和开展甘青川边工作都很有益。我们过去 17 次争取项谦，以至后来进剿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为了项谦一个人，而是为争取更多的藏族头领，也就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项谦如归来，仍坚决按告各族人民书所定 4 条办事。

省委、省政府赴昂拉工作组坚决贯彻西北局的指示，通过与尖扎工委，以及赛池活佛、成勒活佛反复研究，决定派出曾参加叛乱被政府宽大释放的完德太等 11 人，持昂拉八庄及项谦家属的信去寻找项谦。

这时，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中。党和政府在昂拉平叛后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卓有成效的安置救济工作，不仅深深感动了昂拉地区的群众，而且对逃亡在外的项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对自己的部下说：“我带领你们顶住了马步芳军队的进攻，因为马家军糟蹋藏民，藏民群起反对。

但我们顶不住共产党军队的进攻，因为共产党的军队爱护藏民，帮助藏民，藏民的心向着他们。”

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带着11个人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交出长短枪16支、子弹2583发、望远镜1架和马5匹。

项谦回到昂拉自己家里，环视整个大院，看到人民政府对他的一切财产和家人都保护和照顾得很好，尖扎区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安心生产，深受感动，主动找中共尖扎工委书记王鹏远承认自己的错误，说：“我过去杀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打过解放军，罪恶很大，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做到了仁至义尽，今后一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改正错误，与土匪脱离关系，再不做坏事。”

7月31日，项谦来到西宁，受到省党政领导的亲切接见。省政府主席赵寿山、省委书记张仲良在接见项谦时明确表示对其既往不咎，保留其千户职位。张仲良同志还向项谦解说了有关党的民族政策的许多具体问题。8月7日，省协商委员会召集各族各界民主人士座城会，对项谦归向人民表示欢迎。项谦在西宁住留期间，参观了洗毛厂、民族公学。

8月10日，项谦从西宁起程去兰州，参加了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毕业典礼晚会。会上，项谦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甘肃省党政负责同志敬献哈达。

11日，习仲勋为欢迎项谦举行招待会。席间，习仲勋对项谦说：“你回来人民是欢迎的，今后再不要受特务土匪的欺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同日，《青海日报》发表了项谦的署名文章《归向人民后的感想》。

14 日，项谦返回西宁。9 月 8 日，（人民日报）载文向全国介绍了争取项谦、平息昂拉叛乱的情况。

项谦归向人民后，协助党和政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3 年 6 月当选为尖扎县县长，以后又任青海省黄南自治州副州长。1958 年病逝。

第十一章 “陆上游击根据地”覆灭

青海解放不久，在我军平息了大通、门源等地区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消灭了马英、马老五、马折麻禄、鲁国佐等股匪之后，青海境内还存在着最后一支政治土匪——马元祥股匪。

这是一支以蒋马的残余分子和恶霸地主为骨干、由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亲手扶植并直接指挥的反革命武装。他们在美蒋空投支援和空特控制下，盘踞在青海省东南部与甘川交界的四旗（现河南蒙旗）、卓格尼玛、欧拉、巧科地区，伺机策动暴乱，妄图颠覆人民政权。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指示，我军于 1952 年至 1953 年 5 月对马元祥这股政治匪帮进行了围剿。

匪首马元祥系下俄洛藏族人，其藏名叫拉木藏，回名叫染木赞。该匪 18 岁以前在临夏给青海镇守使马麟放牛羊、种田，为对马麟感恩戴德故改姓马，1948 年青海解放前夕任伪 82 军少将高参。

青海解放后，马元祥被送至解放军官训练处学习。学习期间，他假装积极，内心深处却充满着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刻骨仇恨。学习后遣返回乡不久，他便潜匿于青海东南四

旗地区，积极收拢反革命分子和敌伪军官，组织反革命武装。他还向青南各部落派遣匪徒，进行窜扰和联络，扩大势力，建立“陆上游击根据地”，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妄图恢复蒋马匪帮的反动统治。

马元祥股匪初期仅 25 人，到 1953 年 2 月便发展到 170 多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这股土匪十分重视，寄予很大的希望，委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 102 路”。马元祥、马德福分别任正、副司令，马希贤任参谋长，并先后五次给该股匪空投枪支、弹药、电台、物资等，仅在 1953 年 3 月 19 日就空投了轻重机枪 13 挺、长短枪 40 支。还空投了伪“西北地区联络专员”程毓杰、“西北情报处长”刘绍琴等 6 名特务，进行控制和指挥，其电台除了和台湾联系外，还和美帝进行联络。

由于该股匪首大都是马步芳旧时军官，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凶狠狡猾。为了保存实力，在军事上避免与我大部队作战，遇我优势兵力时即化整为零，分散隐蔽；遇我兵力薄弱时，则乘机偷袭。

1952 年 12 月 17 日，中共青海省委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在加强民族团结，特别在做好被欺骗的部落、宗教头人及其它准备工作中，采取坚决军事清剿的方针”的指示精神，发出了关于消灭马良、马元祥股匪的指示，提出了“坚持政治争取，分化瓦解与军事消灭同时并进”的方针。同年 12 月 26 日青海军区根据西北军区和青海省委指示精神，发出了剿匪肃特补充指示。1953 年 1 月 18 日又下达了进剿马良、马元祥股匪计划。

同年 2 月 11 日，青海军区政治部下达了经青海省委、

西北军区和西北局审查同意的关于进剿马良、马元祥股匪在执行政策上的几项规定。强调指出：“在坚决剿灭马良、马元祥股匪中，必须严格地确定地坚持团结少数民族、保护宗教的政策，绝不许把当地少数民族部落和宗教以及千百户制度和反革命土匪混淆起来，这是取得胜利的決定条件。”

1953 年 3 月，西北军区组成了甘青剿匪指挥部，确定由甘肃军区围歼马良股匪，青海军区包干消灭马元祥股匪，并积极配合邻区和兄弟部队搜剿青海南部流窜和潜伏之残匪，开辟该地区的工作。

在省委的领导下，抽调人员组成青海南部工作委员会，由李书茂任书记，马芳富任副书记，统一领导该地区同仁、同德、循化、尖扎、贵德、四旗、果洛剿匪工作。

青南剿匪指挥部由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李书茂任司令员兼政委，马芳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工委与指挥部均设于四旗、同仁交界地区的瓜什则部落南部。决定以骑兵 2 团、独立团 2 营、果洛支队组成第一线剿匪部队；以 55 师 1 个营、玉树支队、独立 1 营和 2 营各 1 个连，及青南各县公安队和民兵自卫队，担任第二线扎点堵击任务。总计兵力 4009 人。

部队于 1953 年 3 月初由西宁、化隆、莫曲沟分路向战区开进。18 日剿指率骑 2 团、独立团 2 营、独立营 4 连前进至四旗（即河南蒙旗）曲尔寺附近集结；果洛支队亦于 3 月 25 日到达齐汉马寺及以东地区，担任堵击；第二线部队和民兵自卫队分别进至青康公路及杂楞口、兰旗山、瓜什则、麦秀、杂马羊曲、拉加寺等地区进行巡逻，控制要点，搜剿潜伏的残匪。

马元祥股匪于 3 月 24 日渡黄河南逃。指挥部命令骑 2 团疾速渡河追击。当晚，先头分队 3 连赶到黄河边，没有行人，没有船只，为了尽快追上逃匪，指挥部又命令部队轻装前进，强渡黄河。3 连连长张元贵向全连做了简短有力的动员后，战士们就脱下棉裤，穿着裤衩骑马渡河。夜晚寒风凛冽，河水凉冻刺骨，冰茬子划破了战士们的腿，鲜血直流。

六〇炮班副班长张全俊，在渡河时突然落马掉进水里，背上沉重的炮身一下把他拖到河底，他大胆沉着，很快把炮身解下挂在一只手臂上，用另一只手划着浮出水面。他看到战马已被冲出老远，便顾不得已经冻得麻木的双腿，毅然顺水游去，在下游 200 多米处追上了自己的马。

炊事员何秉全，四川人，有三十七八岁，看去身体比较瘦弱，他积极要求参加抢救队，在急流中连续救出两个战友，当救第 3 个人时，由于体力不支壮烈牺牲。在这次渡河中有 15 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青春和涛涛黄河共存齐鸣。

马元祥逃至巧科，发现我军准备强渡黄河，于 3 月 30 日在仓促接受台湾空投补给后，星夜西窜，潜藏在积石山南部协和日部落。

渡过黄河后，我剿匪部队就沿着终年积雪的积石山前进。4 月，祖国的内地已是春暖花开，这里却还是一片冰封世界。山路陡峭，加上缺氧，战士们牵着马攀山越岭，个个走得气喘吁吁，满身是汗。摘了帽子，头上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棉衣被汗水湿透了，又结成冰。

夜里宿营，没有帐篷也没有架火取暖的燃料，战士们就用冻肿的双手扒开积雪躺在地上盖着大衣，几个人或全班挤

在一起睡。半夜冻醒了，大家就起来唱歌，跳藏族舞，跳得身子热乎了再睡一会儿。

一个风雪夜，部队在山中宿营，战士宾芝伦主动要求站岗放哨。到半夜别的同志去换哨，只见他横握钢枪像铁铸似地坚守在哨位上。走近一看，才发现这位年轻可爱的战士已经停止了呼吸，被冻死在哨位上。

由于部队行军快，后勤供应跟不上，战马的草料吃光了，不少班排自带的干粮也剩下不多，甚至连喝水都困难了。战士们把面袋翻过来，把抖下的面粉集中到一块儿，熬点面糊糊吃。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战胜了严寒和种种困难，踏过两千里冰天雪地，终于追上了敌人，将马元祥股匪包围在得苦乎沟的西山一带。

5月7日上午，马元祥股匪从加扎隆涯山地区向西仓皇逃跑。

指挥部命令骑4连快速翻过4000多米的加扎隆涯山，堵住股匪西逃的道路，2、3连继续追击。

骑4连刚刚爬上山顶，正与迎面上来的土匪相遇，大家来不及歇口气，卧倒就打。两挺转盘机枪和所有步枪一起开火，子弹像冰雹般飞向敌群。土匪受到突然打击，顿时人仰马翻，晕头转向。

这支股匪大部分是原来马步芳队伍中营团以下的军官和兵痞，加上有1名从台湾派来的少将联络专员和几个空降特务指挥，因此既狡猾又顽固。此时他们眼看难突重围，就把几个山头的残匪纠集到一起做拼死挣扎。

9时许，敌人抢占了东山头有利地形，以7挺轻重两用

机枪向我猛烈射击，并两次向我军骑 2 团 4 连阵地反冲击，企图夺路逃跑，均被 4 连击退。

这时，2 团 3 连赶到，抢占了西南山头，向匪发起猛攻，2 连跟进，我军东线部队也按时进至攻击位置。

在我军各分队包围攻击下，经两小时激战，击伤匪首马元祥，击毙匪第 1 纵队司令马全彪，众匪开始动摇，纷纷向山下溃逃。

此时，我军 2、3、4 连及独立团 2 营发扬猛打猛冲精神，紧紧咬住敌人，继续追击，将匪大部歼灭于得苦乎沟西侧尕什卡尼哈以东地区。15 时 30 分，战斗结束。

匪首马元祥见势不妙，单独偷偷逃跑了。当他跑到黄河边时，被参战的公安战士隔岸一枪打死在河滩上，其他溃逃的散匪一个个也被部队和民兵抓了活的。

截止 5 月 26 日，除匪副司令马德福等 7 人漏网外，共歼匪 139 名，缴获电台 4 部，轻重机枪 14 挺，长短枪 189 支，各种子弹 1.8 万余发，白洋 8496 块，假人民币 1532 万元，骡马 100 余匹，还有其它物资。

其余溃逃残匪，后来也被我各地军民陆续抓获。

红旗插上了青海大地，唤来了草原的春天。